# 《华盖集续编的续编》

目录

[《华盖集续编的续编》 1](#_Toc44183915)

[厦门通信[373] 1](#_Toc44183916)

[厦门通信（二）[383] 3](#_Toc44183917)

[《阿Q正传》的成因[389] 5](#_Toc44183918)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403] 10](#_Toc44183919)

[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416] 14](#_Toc44183920)

[厦门通信（三）[422] 15](#_Toc44183921)

[海上通信[432] 18](#_Toc44183922)

在厦门岛的四个月，只做了几篇无聊文字，除去最无聊者，还剩六篇，称为《华盖集续编的续编》，总算一年中所作的杂感全有了。

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鲁迅记。

# 厦门通信[373]

H.M.[374]兄：

我到此快要一个月了，懒在一所三层楼上，对于各处都不大写信。这楼就在海边，日夜被海风呼呼地吹着。海滨很有些贝壳，检了几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四围的人家不多，我所知道的最近的店铺，只有一家，卖点罐头食物和糕饼，掌柜的是一个女人，看年纪大概可以比我长一辈。

风景一看倒不坏，有山有水。我初到时，一个同事便告诉我：山光海气，是春秋早暮都不同。还指给我石头看：这块像老虎，那块像癞虾蟆，那一块又像什么什么……。我忘记了，其实也不大相像。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但好几天，却忘不掉郑成功[375]的遗迹。离我的住所不远就有一道城墙，据说便是他筑的。一想到除了台湾，这厦门乃是满人入关以后我们中国的最后亡的地方，委实觉得可悲可喜。台湾是直到一六八三年，即所谓“圣祖仁皇帝”二十二年才亡的，这一年，那“仁皇帝”们便修补“十三经”和“二十一史”的刻板[376]。现在呢，有些国民巴不得读经；殿板“二十一史”也变成了宝贝，古董藏书家不惜重资，购藏于家，以贻子孙云。然而郑成功的城却很寂寞，听说城脚的沙，还被人盗运去卖给对面鼓浪屿的谁，快要危及城基了。[377]有一天我清早望见许多小船，吃水很重，都张着帆驶向鼓浪屿去，大约便是那卖沙的同胞。

周围很静；近处买不到一种北京或上海的新的出版物，所以有时也觉得枯寂一些，但也看不见灰烟瘴气的《现代评论》。这不知是怎的，有那么许多正人君子，文人学者执笔，竟还不大风行。

这几天我想编我今年的杂感了。自从我写了这些东西，尤其是关于陈源的东西以后，就很有几个自称“中立”的君子给我忠告，说你再写下去，就要无聊了。我却并非因为忠告，只因环境的变迁，近来竟没有什么杂感，连结集旧作的事也忘却了。前几天的夜里，忽然听到梅兰芳[378]“艺员”的歌声，自然是留在留声机里的，像粗糙而钝的针尖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于是我就想到我的杂感，大约也刺得佩服梅“艺员”的正人君子们不大舒服罢，所以要我不再做。然而我的杂感是印在纸上的，不会振动空气，不愿见，不翻他开来就完了，何必冒充了中立来哄骗我。我愿意我的东西躺在小摊上，被愿看的买去，却不愿意受正人君子赏识。世上爱牡丹的或者是最多，但也有喜欢曼陀罗[379]花或无名小草的，朋其还将霸王鞭种在茶壶里当盆景哩[380]。不过看看旧稿，很有些太不清楚了，你可以给我抄一点么？

此时又在发风，几乎日日这样，好像北京，可是其中很少灰土。我有时也偶然去散步，在丛葬中，这是Borel[381]讲厦门的书上早就说过的：中国全国就是一个大墓场。墓碑文很多不通：有写先妣某而没有儿子的姓名的；有头上横写着地名的；还有刻着“敬惜字纸”四字的，不知道叫谁敬惜字纸。这些不通，就因为读了书之故。假如问一个不识字的人，坟里的人是谁，他道父亲；再问他什么名字，他说张二；再问他自己叫什么，他说张三。照直写下来，那就清清楚楚了。而写碑的人偏要舞文弄墨，所以反而越舞越胡涂，他不知道研究“金石例”[382]的，从元朝到清朝就终于没有了局。

我还同先前一样；不过太静了，倒是什么也不想写。

鲁迅。九月二十三日。

# 厦门通信（二）[383]

小峰兄：

《语丝》百一和百二期，今天一同收到了。许多信件一同收到，在这里是常有的事，大约每星期有两回。我看了这两期的《语丝》特别喜欢，恐怕是因为他们已经超出了一百期之故罢。在中国，几个人组织的刊物要出到一百期，实在是不容易的。

我虽然在这里，也常想投稿给《语丝》，但是一句也写不出，连“野草”也没有一茎半叶。现在只是编讲义。为什么呢？这是你一定了然的：为吃饭。吃了饭为什么呢？倘照这样下去，就是为了编讲义。吃饭是不高尚的事，我倒并不这样想。然而编了讲义来吃饭，吃了饭来编讲义，可也觉得未免近于无聊。别的学者们教授们又作别论，从我们平常人看来，教书和写东西是势不两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书，或者发狂变死地写东西，一个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两条路。

忽然记起一件事来了，还是夏天罢，《现代评论》上仿佛曾有正人君子之流说过：因为骂人的小报流行，正经的文章没有人看，也不能印了。[384]我很佩服这些学者们的大才。不知道你可能替我调查一下，他们有多少正经文章的稿子“藏于家”，给我开一个目录？但如果是讲义，或者什么民法八万七千六百五十四条之类，那就不必开，我不要看。

今天又接到漱园[385]兄的信，说北京已经结冰了。这里却还只穿一件夹衣，怕冷就晚上加一件棉背心。宋玉[386]先生的什么“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廪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等类妙文，拿到这里来就完全是“无病呻吟”。白露不知可曾“下”了百草，梧楸却并不离披，景象大概还同夏末相仿。我的住所的门前有一株不认识的植物，开着秋葵似的黄花。我到时就开着花的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起的；现在还开着；还有未开的蓓蕾，正不知道他要到什么时候才肯开完。“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我近来很有些怕敢看他了。还有鸡冠花，很细碎，和江浙的有些不同，也红红黄黄地永是这样一盆一盆站着。

我本来不大喜欢下地狱，因为不但是满眼只有刀山剑树[387]，看得太单调，苦痛也怕很难当。现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388]的。

然而荷叶却早枯了；小草也有点萎黄。这些现象，我先前总以为是所谓“严霜”之故，于是有时候对于那“廪秋”不免口出怨言，加以攻击。然而这里却没有霜，也没有雪，凡萎黄的都是“寿终正寝”，怪不得别个。呜呼，牢骚材料既被减少，则又有何话之可说哉！

现在是连无从发牢骚的牢骚，也都发完了。再谈罢。从此要动手编讲义。

鲁迅。十一月七日。

# 《阿Q正传》的成因[389]

在《文学周报》二五一期里，西谛先生谈起《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390]这不觉引动我记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来说一说，一则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则还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谛先生的原文——

“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无因的。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如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现在姑且勿论。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391]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也没有料。不过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也不很忙，因为不很有人知道鲁迅就是我。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

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392]这些人有四类：一类是为要研究小说，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类单是好奇；一类是因为我也做短评，所以特地揭出来，想我受点祸；一类是以为于他有用处，想要钻进来。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393]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394]，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现代评论》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395]）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396]，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397]了么？

《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398]，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399]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无法再说“先生，《阿Q正传》……。”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别的去。另干了别的什么，现在也已经记不清，但大概还是这一类的事。

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不过这也无法，谁能开首就料到人们的“大团圆”？不但对于阿Q，连我自己将来的“大团圆”，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样。终于是“学者”，或“教授”乎？还是“学匪”或“学棍”呢？“官僚”乎，还是“刀笔吏”呢？“思想界之权威”乎，抑“思想界先驱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艺术家”？“战士”？抑又是见客不怕麻烦的特别“亚拉籍夫”乎？乎？乎？乎？乎？

但阿Q自然还可以有各种别样的结果，不过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400]。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在这事实发生以前，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这里枪毙一个强盗，两个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枪，一共打了七枪。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还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这么多。当时我便对我的一群少年同学们发感慨，说：这是民国初年初用枪毙的时候的情形；现在隔了十多年，应该进步些，无须给死者这么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场，刑吏就从后脑一枪，结果了性命，本人还来不及知道已经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区”，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远。

但是前几天看见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报》，又知道我的话并不的确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条新闻，题目是《杜小拴子刀铡而死》，共分五节，现在撮录一节在下面——

▲杜小拴子刀铡余人枪毙 先时，卫戍司令部因为从了毅军各兵士的请求，决定用“枭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场以前，刑场已预备好了铡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长形的，下边是木底，中缝有厚大而锐利的刀一把，刀下头有一孔，横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动，杜等四人入刑场之后，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车，就叫他们脸冲北，对着已备好的刑桌前站着。……杜并没有跪，有外右五区的某巡官去问杜：要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后来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时行刑兵已将刀抬起，杜枕到适宜的地方后，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铡，杜的身首，就不在一处了。当时血出极多。在旁边跪等枪决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赵振一名，身上还发起颤来。后由某排长拿手枪站在宋等的后面，先毙宋振山，后毙李有三赵振，每人都是一枪毙命。……先时，被害程步墀的两个儿子忠智忠信，都在场观看，放声大哭，到各人执刑之后，去大喊：爸！妈呀！你的仇已报了！我们怎么办哪？听的人都非常难过，后来由家族引导着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个天才，真感着时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出记叙这样情景的小说来，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以为是说着包龙图[401]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一世纪，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

这真是怎么好……。

至于《阿Q正传》的译本，我只看见过两种。[402]法文的登在八月分的《欧罗巴》上，还止三分之一，是有删节的。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说什么。只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一是“三百大钱九二串”当译为“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译音，因为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

十二月三日，在厦门写。

#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403]

阔别了多年的S F[404]君，忽然从日本东京寄给我一封信，转来转去，待我收到时，去发信的日子已经有二十天了。但这在我，却真如空谷里听到跫然的足音[405]。信函中还附着一片十一月十四日东京《国民新闻》的记载，是德富苏峰[406]氏纠正我那《小说史略》的谬误的。

凡一本书的作者，对于外来的纠正，以为然的就遵从，以为非的就缄默，本不必有一一说明下笔时是什么意思，怎样取舍的必要。但苏峰氏是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三藏取经记》[407]的收藏者，那措辞又很波俏，因此也就想来说几句话。

首先还得翻出他的原文来——

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 苏峰生

顷读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有云：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旧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张家印”，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世因以为宋刊，然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

这倒并非没有聊加辩正的必要。

《大唐三藏取经记》者，实是我的成篑堂的插架中之一，而《取经诗话》的袖珍本，则是故三浦观树将军的珍藏。这两书，是都由明慧上人和红叶广知于世，从京都栂尾高山寺散出的。看那书中的高山寺的印记，又看高山寺藏书目录，都证明着如此。

这不但作为宋椠的稀本；作为宋代所著的说话本（日本之所谓言文一致体），也最可珍重的的罢。然而鲁迅氏却轻轻地断定道，“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过于太早计了。

鲁迅氏未见这两书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见，则其为宋椠，决不容疑。其纸质，其墨色，其字体，无不皆然。不仅因为张家是宋时的临安的书铺。

加之，至于成篑堂的《取经记》，则有着可以说是宋版的特色的阙字。好个罗振玉氏，于此早已觉到了。

皆（三浦本，成篑堂本）为高山寺旧藏。而此本（成篑堂藏《取经记》）刊刻尤精，书中驚字作，敬字缺末笔，盖亦宋椠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

想鲁迅氏未读罗氏此文，所以疑是或为元人之作的罢。即使世间多不可思议事，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

罗振玉氏对于此书，曾这样说。宋代平话，旧但有《宣和遗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话》，《京本小说》，渐有重刊本。宋人平话之传于人间者，至是遂得四种。因为是斯学界中如此重要的书籍，所以明白其真相，未必一定是无用之业罢。

总之，苏峰氏的意思，无非在证明《三藏取经记》等是宋椠。其论据有三——

一 纸墨字体是宋；

二 宋讳缺笔[408]；

三 罗振玉[409]氏说是宋刻。

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错误，一定很多。但《三藏法师取经记》及《诗话》两种，所见的却是罗氏影印本，纸墨虽新，而字体和缺笔是看得出的。那后面就有罗跋，正不必再求之于《雪堂校刊群书叙录》，我所谓“世因以为宋刊”，即指罗跋而言。现在苏峰氏所举的三证中，除纸墨因确未目睹，无从然否外，其余二事，则那时便已不足使我信受，因此就不免“疑”起来了。

某朝讳缺笔是某朝刻本，是藏书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秘诀，只要稍看过几部旧书的人，大抵知道的。何况缺笔的驚字的怎样地触目。但我却以为这并不足以确定为宋本。前朝的缺笔字，因为故意或习惯，也可以沿至后一朝。例如我们民国已至十五年了，而遗老们所刻的书，儀字还“敬缺末笔”。非遗老们所刻的书，寜字玄字也常常缺笔，或者以甯代寜，以元代玄。这都是在民国而讳清讳；不足为清朝刻本的证据。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易林注》[410]残本（现有影印本，在《四部丛刊》中），恆字搆字都缺笔的，纸质，墨色，字体，都似宋；而且是蝶装[411]，缪荃荪[412]氏便定为宋本。但细看内容，却引用着阴时夫的《韵府群玉》[413]，而阴时夫则是道道地地的元人。所以我以为不能据缺笔字便确定为某朝刻，尤其是当时视为无足重轻的小说和剧曲之类。

罗氏的论断，在日本或者很被引为典据罢，但我却并不尽信奉，不但书跋，连书画金石的题跋，无不皆然。即如罗氏所举宋代平话四种中，《宣和遗事》[414]我也定为元人作，但这并非我的轻轻断定，是根据了明人胡应麟[415]氏所说的。而且那书是抄撮而成，文言和白话都有，也不尽是“平话”。

我的看书，和藏书家稍不同，是不尽相信缺笔，抬头，以及罗氏题跋的。因此那时便疑；只是疑，所以说“或”，说“未可知”。我并非想要唐突宋椠和收藏者，即使如何廓大其冒昧，似乎也不过轻疑而已，至于“轻轻地断定”，则殆未也。

但在未有更确的证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证明之后，就成为这样的事：鲁迅疑是元刻，为元人作；今确是宋椠，故为宋人作。无论如何，苏峰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这滑稽剧，是未必能够开演的。

然而在考辨的文字中杂入一点滑稽轻薄的论调，每容易迷眩一般读者，使之失去冷静，坠入彀中，所以我便译出，并略加说明，如上。

十二月二十日。

# 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416]

《新女性》[417]八月号登有“狂飙社[418]广告”，说：“狂飙运动的开始远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兹为大规模地进行我们的工作起见于北京出版之《乌合》《未名》《莽原》《弦上》[419]四种出版物外特在上海筹办《狂飙丛书》及一篇幅较大之刊物”云云。我在北京编辑《莽原》，《乌合丛书》，《未名丛刊》三种出版物，所用稿件，皆系以个人名义送来；对于狂飙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甚么。今忽混称“合办”，实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则假借虚名，加我纸冠，已非一次，业经先有陈源在《现代评论》上，近有长虹在《狂飙》上，迭加嘲骂，而狂飙社一面又锡以第三顶“纸糊的假冠”[420]，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虽“世故的老人”[421]，亦身心之交病矣。只得又来特此声明：我也不是“思想界先驱者”即英文Forerunner之译名。此等名号，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倘见者因此受愚，概与本人无涉。

# 厦门通信（三）[422]

小峰兄：

二十七日寄出稿子两篇，[423]想已到。其实这一类东西，本来也可做可不做，但是一则因为这里有几个少年希望我耍几下，二则正苦于没有文章做，所以便写了几张，寄上了。本地也有人要我做一点批评厦门的文字，然而至今一句也没有做，言语不通，又不知各种底细，从何说起。例如这里的报纸上，先前连日闹着“黄仲训霸占公地”[424]的笔墨官司，我至今终于不知道黄仲训何人，曲折怎样，如果竟来批评，岂不要笑断真的批评家的肚肠。但别人批评，我是不妨害的。以为我不准别人批评者，诬也；[425]我岂有这么大的权力。不过倘要我做编辑，那么，我以为不行的东西便不登，我委实不大愿意做一个莫名其妙的什么运动的傀儡。

前几天，卓治[426]睁大着眼睛对我说，别人胡骂你，你要回骂。还有许多人要看你的东西，你不该默不作声，使他们迷惑。你现在不是你自己的了。我听了又打了一个寒噤，和先前听得有人说青年应该学我的多读古文时候相同。呜呼，一戴纸冠，遂成公物，负“帮忙”之义务，有回骂之必须，然则固不如从速坍台，还我自由之为得计也。质之高明，未识以为然否？

今天也遇到了一件要打寒噤的事。厦门大学的职务，我已经都称病辞去了。百无可为，溜之大吉。然而很有几个学生向我诉苦，说他们是看了厦门大学革新的消息[427]而来的，现在不到半年，今天这个走，明天那个走，叫他们怎么办？这实在使我夹脊梁发冷，哑口无言。不料“思想界权威者”或“思想界先驱者”这一顶“纸糊的假冠”，竟又是如此误人子弟。几回广告（却并不是我登的），将他们从别的学校里骗来，而结果是自己倒跑掉了，真是万分抱歉。我很惋惜没有人在北京早做黑幕式的记事，将学生们拦住。“见面时一谈，不见时一战”[428]哲学，似乎有时也很是误人子弟的。

你大约还不知道底细，我最初的主意，倒的确想在这里住两年，除教书之外，还希望将先前所集成的《汉画象考》和《古小说钩沈》印出。[429]这两种书自己印不起，也不敢请你印。因为看的人一定很少，折本无疑，惟有有钱的学校才合适。及至到了这里，看看情形，便将印《汉画象考》的希望取消，并且自己缩短年限为一年。其实是已经可以走了，但看着语堂[430]的勤勉和为故乡做事的热心，我不好说出口。后来豫算不算数了，语堂力争；听说校长就说，只要你们有稿子拿来，立刻可以印。于是我将稿子拿出去，放了大约至多十分钟罢，拿回来了，从此没有后文。这结果，不过证明了我确有稿子，并不欺骗。那时我便将印《古小说钩沈》的意思也取消，并且自己再缩短年限为半年。语堂是除办事教书之外，还要防暗算，我看他在不相干的事情上，弄得力尽神疲，真是冤枉之至。

前天开会议，连国学院的周刊也几乎印不成了；然而校长的意思，却要添顾问，如理科主任之流，都是顾问，据说是所以连络感情的。我真不懂厦门的风俗，为什么研究国学，就会伤理科主任之流的感情，而必用顾问的绳，将他络住？联络感情法我没有研究过；兼士[431]又已辞职，所以我决计也走了。现在去放假不过三星期，本来暂停也无妨，然而这里对于教职员的薪水，有时是锱铢必较的，离开学校十来天也想扣，所以我不想来沾放假中的薪水的便宜，至今天止，扣足一月。昨天已经出题考试，作一结束了。阅卷当在下月，但是不取分文。看完就走，刊物请暂勿寄来，待我有了驻足之所，当即函告，那时再寄罢。

临末，照例要说到天气。所谓例者，我之例也；怕有批评家指为我要勒令天下青年都照我的例，所以特此声明：并非如此。天气，确已冷了。草也比先前黄得多；然而我那门前的秋葵似的黄花却还在开着，山里也还有石榴花。苍蝇不见了，蚊子间或有之。

夜深了，再谈罢。

鲁迅。十二月三十一日。

再：睡了一觉醒来，听到柝声，已经是五更了。这是学校的新政，上月添设，更夫也不止一人。我听着，才知道各人的打法是不同的，声调最分明地可以区别的有两种——

托，托，托，托托！

托，托，托托！托。

打更的声调也有派别，这是我先前所不知道的。并以奉告，当作一件新闻。

# 海上通信[432]

小峰兄：

前几天得到来信，因为忙于结束我所担任的事，所以不能即刻奉答。现在总算离开厦门坐在船上了。船正在走，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海上。总之一面是一望汪洋，一面却看见岛屿。但毫无风涛，就如坐在长江的船上一般。小小的颠簸自然是有的，不过这在海上就算不得颠簸；陆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

同舱的一个是台湾人，他能说厦门话，我不懂；我说的蓝青官话[433]，他不懂。他也能说几句日本话，但是，我也不大懂得他。于是乎只好笔谈，才知道他是丝绸商。我于丝绸一无所知，他于丝绸之外似乎也毫无意见。于是乎他只得睡觉，我就独霸了电灯写信了。

从上月起，我本在搜集材料，想趁寒假的闲空，给《唐宋传奇集》做一篇后记[434]，准备付印，不料现在又只得搁起来。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省得人来谬托知己，舐皮论骨，什么是“入于心”的。[435]但要付印，也还须细看一遍，改正错字，颇费一点工夫。因此一时也不能寄上。

我直到十五日才上船，因为先是等上月份的薪水，后来是等船。在最后的一星期中，住着实在很为难，但也更懂了一些新的世故，就是，我先前只以为要饭碗不容易，现在才知道不要饭碗也是不容易的。我辞职时，是说自己生病，因为我觉得无论怎样的暴主，还不至于禁止生病；倘使所生的并非气厥病，也不至于牵连了别人。不料一部分的青年不相信，给我开了几次送别会，演说，照相，大抵是逾量的优礼，我知道有些不妥了，连连说明：我是戴着“纸糊的假冠”的，请他们不要惜别，请他们不要忆念。但是，不知怎地终于发生了改良学校运动，首先提出的是要求校长罢免大学秘书刘树杞[436]博士。

听说三年前，这里也有一回相类的风潮，结果是学生完全失败，在上海分立了一个大夏大学。[437]那时校长如何自卫，我不得而知；这回是说我的辞职，和刘博士无干，乃是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所以走掉的。这话就登在鼓浪屿的日报《民钟》上，并且已经加以驳斥。但有几位同事还大大地紧张起来，开会提出质问；而校长却答复得很干脆：没有说这话。有的还不放心，更给我放散别种的谣言[438]，要减轻“排挤说”的势力。真是“天下纷纷，何时定乎？”[439]如果我安心在厦门大学吃饭，或者没有这些事的罢，然而这是我所意料不到的。

校长林文庆[440]博士是英国籍的中国人，开口闭口，不离孔子，曾经做过一本讲孔教的书，可惜名目我忘记了。听说还有一本英文的自传，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在正做着《人种问题》。他待我实在是很隆重，请我吃过几回饭；单是饯行，就有两回。不过现在“排挤说”倒衰退了；前天所听到的是他在宣传，我到厦门，原是来捣乱，并非豫备在厦门教书的，所以北京的位置都没有辞掉。

现在我没有到北京，“位置说”大概又要衰退了罢，新说如何，可惜我已在船上，不得而知。据我的意料，罪孽一定是日见其深重的，因为中国向来就是“当面输心背面笑”[441]，正不必“新的时代”的青年[442]才这样。对面是“吾师”和“先生”，背后是毒药和暗箭，领教了已经不只两三次了。

新近还听到我的一件罪案，是关于集美学校[443]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都是秘密世界，外人大抵不大知道。现在因为反对校长，闹了风潮了。先前，那校长叶渊[444]定要请国学院里的人们去演说，于是分为六组，每星期一组，凡两人。第一次是我和语堂。那招待法也很隆重，前一夜就有秘书来迎接。此公和我谈起，校长的意思是以为学生应该专门埋头读书的。我就说，那么我却以为也应该留心世事，和校长的尊意正相反，不如不去的好罢。他却道不妨，也可以说说。于是第二天去了，校长实在沉鸷得很，殷勤劝我吃饭。我却一面吃，一面愁。心里想，先给我演说就好了，听得讨厌，就可以不请我吃饭；现在饭已下肚，倘使说话有背谬之处，适足以加重罪孽，如何是好呢。午后讲演，我说的是照例的聪明人不能做事，因为他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等类的话。那时校长坐在我背后，我看不见。直到前几天，才听说这位叶渊校长也说集美学校的闹风潮，都是我不好，对青年人说话，那里可以说人是不必想来想去的呢。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还在后面摇摇头。

我的处世，自以为退让得尽够了，人家在办报，我决不自行去投稿；人家在开会，我决不自己去演说。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须任凭我说一点我所要说的话，否则，我宁可一声不响，算是死尸。但这里却必须我开口说话，而话又须合于校长之意。我不是别人，那知道别人的意思呢？“先意承志”[445]的妙法，又未曾学过。其被摇头，实活该也。

但从去年以来，我居然大大地变坏，或者是进步了。虽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经没有创伤，或者不再觉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并不觉着一点沉重了。这是我经历了许多旧的和新的世故之后，才获得的。我已经管不得许多，只好从退让到无可退避之地，进而和他们冲突，蔑视他们，并且蔑视他们的蔑视了。

我的信要就此收场。海上的月色是这样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闪烁摇动；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仿佛很温柔。我不信这样的东西是会淹死人的。但是，请你放心，这是笑话，不要疑心我要跳海了，我还毫没有跳海的意思。

鲁迅。一月十六夜，海上。

# 参考文献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11月16日《语丝》周刊第一〇四期。

[2] 指《大衍发微》，后收入《而已集》作附录。

[3]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1月18日《语丝》周刊第六十二期。

[4] 陈源 笔名西滢，参看本卷第85页注〔8〕。

[5] 《现代评论》 参看本卷第84页注〔4〕。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六期（1926年1月2日）发表的《闲话》中称：“我们新年的决心，不如就说以后永远的不管人家的闲事吧。”因为，据他说，“中国爱管闲事的人太少”，所以像他这样爱“代人抱不平”，遇到“许多看不过眼的事情，不得不说两句话”的人，“就常常惹了祸了”。这是他为自己前一年帮助章士钊和杨荫榆压迫学生的种种言行所作的辩护。

[6] “可惜” 此语原为陈西滢对于鲁迅等七教员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的讥评。陈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1925年5月30日）发表的《闲话》中说：“这个宣言语气措词，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这是很可惜的。”

[7] 五色旗 民国成立后至1927年这一时期中国的国旗，红黄蓝白黑五色横列。

[8] 请酒开会 在女师大风潮中，杨荫榆曾一再利用宴会方式，笼络教员，策划压迫学生。在章士钊解散女师大另办女子大学后，女师大部分师生另在宗帽胡同租屋上课，后于1925年11月30日返回原校址复校。12月14日，女子大学也用宴会方式宴请反对学潮的“教育界名流”。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人在席上成立“教育界公理维持会”（次日改名“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于12月16日在《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中说：“同人等以为女师大应否恢复，目的如何，另属一问题，而少数人此种横暴行为，理应在道德上加以切实否认。”

[9] 1925年8月，章士钊决定在女师大校址另立女子大学，19日派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前往筹备。刘于22日在军警配合下雇用打手、女仆等殴曳学生出校。

[10] 塞文狄斯（M.de Cervantes，1547—1616），通译塞万提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堂吉诃德》等。芮恩施（P.S.Reinsch，1869—1923），曾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1913年至1919年任美国驻华公使。罗家伦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1月）发表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中，曾引芮恩施的话来作为“外国人之中国人译外国小说观”的论据，并称他“是美国一位很大的学者”。这里所说的“因为在讲什么文艺学术的一篇论文上见过他的名字”，即指罗家伦的这篇论文。

[11] “邻猫生子” 指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引英国斯宾塞的话：“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

[12] “如苍生何” 语出《世说新语·排调》：谢安“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按谢安的字）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后常用作“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13] 沙滩 北京地名，当时北京大学第一院所在地。下文的南池子，也是北京地名。

[14] 大琦 即王品青（？—1927），河南济源人，北京大学毕业，《语丝》撰稿人。曾任北京孔德学校教员。下文所说他留赠作者的《现代评论增刊》，即《〈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1926年1月1日）。

[15] 他“家翰笙” 指陈翰笙（1897—2004），江苏无锡人，社会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曾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1925年12月12日）发表《临时抱佛脚》一文，说北京政治学会图书馆藏书在一万册以上，“会员里十九是留学欧美归国的人”；他根据馆内借书统计表，指出1925年因有“沪案（按即五卅惨案）和关会（按即关税会议）两个热闹的时务题目”，借书的人数较前一年大为增多；因而他用“临时抱佛脚”这句俗谚来形容当时学术界大部分人平时的“懒惰”。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发表的《做学问的工具》一文中引用陈翰笙的话，称他为“‘吾家’翰笙”。

[16] 溥仪 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清朝末代皇帝宣统。庄士敦（1874—1938），英国人。曾任威海卫“英国租借地行政长官”，1919年起，任溥仪的英文教师，以后即长期和溥仪保持密切关系。1924年春夏间，曾与金梁、康有为等密谋复辟；同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后，他又与郑孝胥等于12月护送溥仪逃往日本使馆。

[17] 章士钊早年署名青桐，后改秋桐，自1925年7月创办《甲寅》周刊时起，又改署孤桐（见《甲寅》周刊第一号《字说》）。陈西滢在文章中常称他为“孤桐先生”。

[18] 1925年11月28日，北京民众为要求关税自主和反对段祺瑞政府举行示威游行。群众对于段祺瑞及其下属如章士钊、朱深等人深为愤恨，游行时曾到他们的住宅示威；事后，章士钊即写了一篇《寒家再毁记》（按同年5月7日，因章士钊禁止学生纪念国耻，学生曾赴章宅质问，发生冲突，因此他称这次为“再毁”），说他“家中所有。以中西书籍为第一项。……西籍为愚历年续续购办。哲学政计诸门差完。……最后一批。乃两年前在柏林所得。甚称富有。”又说当日群众“一拥而入。遇物即毁。……自插架以至案陈。凡书之属无完者。”（见1925年12月5日《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号）接着，陈西滢在《做学问的工具》一文里又附和说：“孤桐先生在英国德国买的书是我亲自看见的。他柏林寓中两间屋，几乎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我不知道这些书都在北京否。从《寒家再毁记》看来，好像他们夫妇两位的藏书都散失了。这真是很可惜的。”

[19] 刘百昭在章士钊任教育总长时期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兼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1925年11月28日北京民众因要求关税自主示威游行时，刘的住宅也受到冲击，他便乘机吞没存放家中的艺专公款八千元，捏词呈报教育部说公款全数被劫，无法赔垫。

[20] 火神庙 在北京琉璃厂。旧时每年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庙会期间，设有很多临时性的古玩玉器摊。

[21] “打落门牙” 参看本卷第165页注〔17〕。

[22] “交臂失之” 语出《庄子·田子方》：“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

[23] 陈西滢在《做学问的工具》里颂扬芮恩施说：“我想着要是那时美国公使莱恩施没有竭力的提倡，组织什么政治学会，办什么图书馆，那么今年不要说有了两个热闹的时务题目，就有了二十个热闹的时务题目，也就要借书也无从借起了。”

[24] 美国退还的赔款 指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的“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美国的部分。美国在所谓“资助”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名义下，于1908年第一次将赔款中的一部分退还我国；1924年又决定将余款全数退还。这里所说用以扩充北京图书馆的经费，即在第二次退款之内。

[25]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末与康有为同为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失败后逃亡日本。1902年在东京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政府司法、财政总长，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著有《饮冰室文集》等。

[26] 陈西滢在《做学问的工具》里说过这样的话：“要学者去弄他们的学问，最重要的，第一，便是学者能有固定的收入，不至于镇天的忧柴愁米；第二，便是供给他们比较完善的做学问的工具。……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曾经发表了两篇文章。他对于学者宜有固定收入是看得很清楚的，然而第二种要求他似乎没看到。”参看本书《不是信》第六段。

[27] “四书” 参看本卷第39页注〔6〕。自南宋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撰写《四书章句集注》，才有了“四书”这个名称。

[28] 张之洞（1837—1909） 字孝达，河北南皮人，清末提倡“洋务运动”的大臣。曾任四川学政、湖广总督。“提倡风雅的封藩大臣”，是陈西滢在《做学问的工具》里推崇他的话。《书目答问》，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内所著，成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一说为缪荃孙代笔。“‘四书’，南宋以后之名”，见该书经部第二。“束发小生”，当时章士钊对青年学生常用的蔑称，参看本卷第118页注〔28〕。

[29] 《汉书艺文志》 《汉书》，东汉班固撰。其中《艺文志》是当时所存各种书籍名目的汇编，为我国最早的书目。《隋书经籍志》，《隋书》，唐代魏徵等撰。其中《经籍志》性质和《汉书艺文志》同。

[30] “五经” 指《诗》、《书》、《礼》、《易》、《春秋》。“六经”，“五经”加上《乐经》。“七经”，“五经”加上《论语》、《孝经》。“六艺”，这里指“六经”。

[31] “《春秋》责备贤者” 语出《新唐书·太宗本纪》：“《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这里是求全责备的意思。

[32] 胡适（1891—1962） 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归国后倡导新文化运动。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是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之一。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上的《译诗三首》，是英国诗人勃朗宁的《清晨的分别》、雪莱的《给——》、哈代的《月光里》。

[33] 徐志摩 参看本卷第192页注〔6〕。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上的“译诗一首”，是英国诗人罗赛蒂的《图尔的约翰》。

[34] 西林 丁燮林（1893—1974），字巽甫，笔名西林，江苏泰兴人，物理学家、剧作家。早年留学英国，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压迫》是他所作的一个独幕剧。

[35] 陶孟和（1888—1960） 名履恭，字孟和，天津人，社会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他在该刊《第一周年纪念增刊》上曾发表《现代教育界的特色》一文，题下自注：“这是要到二〇二五年才可以发表——假使当时的状况允许——的一部著作里的几节。”

[36]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1月19日《国民新报副刊》。

[37] 勗本华尔 即叔本华。这里说他“祖述释迦牟尼”，是因为他的思想曾部分地受了印度佛教哲学的影响。他死后，从他的书籍里曾发现医治梅毒的药方，这里说他“暗地里吃一种医治什么病症的药”，即指此事。

[38] “区区佥事” 作者在1912年8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1925年，因支持女师大学潮，于8月中被章士钊非法免职，为此他向平政院提出控告。当时有人借此攻击他因为失去“区区佥事”，所以反对章士钊，没有“学者的态度”。参看《华盖集·“碰壁”之余》。“妄有主张”，是章士钊在给平政院答辩书中指责作者的话。

[39] 安特来夫（Л.Н.Андреев，1871—1919） 通译安德列耶夫，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没有花，没有诗”，出自他的小说《红的笑》：“你知道地球已发狂了，已没有花与歌在地球上了。”（据梅川译文）

[40] 《晨报副刊》 研究系机关报《晨报》的副刊。《晨报》创刊于1916年8月，在北京出版，初名《晨钟报》，1918年12月易名为《晨报》。它的第七版专登文艺类作品，1921年10月12日改名为《晨报副镌》（报眉题为《晨报副刊》）独立出版，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之一。1921年秋至1924年冬约三年间，由孙伏园编辑。鲁迅经常为该刊写稿。从1925年10月起，由现代评论派徐志摩编辑。徐志摩在1926年1月13日《晨报副刊》发表一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盛赞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七期（1926年1月9日）谈法朗士的《闲话》，是“一篇可羡慕的妩媚的文章”。因而希望“上帝保佑他以后只说闲话，不再管闲事！”文中曾讲述了一件关于陈西滢的“家事”：“‘阿哥’，他的妹妹一天对他求告，‘你不要再作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怎么好？’‘你趁早把自己的东西，’闲话先生回答说，‘清点了开一个单子给我，省得出了事情以后你倒来向我阿哥报虚帐！’”

[41] “女媭之婵媛兮”等语，见屈原《离骚》。女媭，一般以为是屈原对其姊的称谓。《说文》：“楚人谓姊为媭。”鲧，夏禹的父亲，相传他因治水无功，被舜杀于羽山。屈灵均，即屈原（约前340—约前278），战国时楚国诗人。

[42] “有根” 这是徐志摩称赞陈西滢的话，见他所作《“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参看本书《无花的蔷薇》第七节。

[43] “关外战事不日将发生” 1925年11月，奉系将领郭松龄秘密和冯玉祥国民军联合，反对张作霖；不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下兵败被杀。但驻守榆关的郭松龄部炮兵旅长魏益三于次年1月3日宣布与国民军合作，改称国民军第四军，继续与张作霖对峙，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势。故报上说“关外战事不日将发生”。“国军一致拥段”，1926年1月9日，段祺瑞在直奉等军阀的压力下被迫通电辞职。国民军为了暂时维持现状，曾表示挽留，故报上有“国军一致拥段”之说。这两则新闻标题，《京报》等均以头号字排印。

[44] 刘百昭于1925年8月19日，奉章士钊命令接收女师大时，与学生发生冲突，他恐吓学生说：“本人稍娴武术，在德时曾徒手格退盗贼多人。”22日，他又雇用女仆、打手百余人随同巡警将女师大学生殴曳出校。1925年9月至次年1月间，他兼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这里所引的骈文是他为《艺专旬刊》所作的《发刊词》中的句子。按当时北京女佣以河北三河县籍为多，故被泛称为“三河县老妈子”。

[45] 孔丘 即孔子，儒家创始人。墨翟（约前468—前376），即墨子，墨家创始人。老聃，即老子，道家创始人。过去一般认为，在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上，儒家、墨家都是主张“有所为”的，他们各自提出一套治理国家的学说，而道家则是主张“无为”而治的。

[46] 关龙逄 夏桀的臣子，因谏桀作酒池被杀。少正卯，春秋时鲁国大夫。据说他聚徒讲学，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据东汉王充《论衡·讲瑞》），孔子任鲁国司寇时，以“乱政”的罪名将他杀害。

[47] 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主要著作有《物种起源》等。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支持者和宣传者。主要著作有《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等。他们认为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必然要经历剧烈的生存斗争。克鲁巴金（П.А.Кропоткин，1842—1921），通译克鲁泡特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他在所著《互助论》中，认为生物进化和人类发展，都有赖于互助，主张用互助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

[48] 勃朗宁夫妇 勃朗宁（R.Browning，1812—1889）和勃朗宁夫人（E.Browning，1806—1861），都是英国诗人。他们曾不顾勃朗宁夫人父亲的反对，秘密结婚并脱离家庭远走意大利。

[49] 尼采（F.Nietzsche，1844—1900） 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他和叔本华都反对妇女解放。叔本华在《妇女论》中诬蔑妇女虚伪、虚荣、无知、缺乏思想，是“本来不配做什么伟大的工作”的人；尼采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说，“妇女必须服从”，“你到女人那里去的时候，不要忘记带一根鞭子”。

[50] 特莱孚斯（A.Dreyfus） 法国犹太籍军官。他在1894年受到军事当局诬告，以泄漏军事机密罪被判处终身苦役。此事曾引起各界进步人士的不满。1897年经人查明真相，要求复审，又未获准。左拉（É.Zola，1840—1902），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萌芽》、《崩溃》、《娜娜》等。他在1897年对此案的材料作了研究后，确信特莱孚斯是无辜的，就给法国总统佛尔写了一封《我控诉》的公开信，控诉法国政府、法庭和总参谋部违反法律和人权。结果左拉被判一年徒刑和罚金，被迫逃往英国伦敦。此案因而引起很大的反响，终于在1906年撤销前判，特莱孚斯仍复军职。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六期（1926年1月2日）发表的那篇声明“不管闲事”的《闲话》里，把杨荫榆、章士钊比附为特莱孚斯而隐以左拉自况。篾片，豪门帮闲的俗称。

[51] 水平线下 当时现代评论社在《现代丛书》广告中，自称他们出版的作品“不会有一本无价值的书，一本读不懂的书，一本在水平线下的书”。学棍学匪，参看本书《学界的三魂》及其注〔1〕、〔2〕。当时现代评论派一些人也对鲁迅进行类似的攻击。

[52] 这一段也是徐志摩在《“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中称赞陈西滢的话。

[53] “管中窥豹” 语出《晋书·王献之传》：“管中窥豹，时见一斑。”

[54] 陶孟和在《现代教育界的特色》一文中说，当时教育界的特色之一是“教育的商业化”。“一种是以授课为营业，……便是俗所谓兼课。……这个时代，学校太多，学者太少，这个僧少粥多的状况，不得不稍牺牲大学者的光阴。所以除了那些蠢笨无学识的，不得不只依赖一个学校收入吃饭的以外，硕学醇儒便不得不在一星期里驰驱——如在北京——于九城之中。”这里的“驰驱于九城”即奔走于北京全城的意思。北京有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东直、西直、朝阳、阜成等九座城门，故以“九城”统称北京全城。

[55]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语出《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56] 小乘教 早期佛教的主要流派，注重个人的修行持戒，自我解脱，自认为是佛教的正统派。它宣传人死后“神不灭”、轮回、因果报应等等，旧时影响很大。

[57] “投畀豺虎” 语出《诗经·小雅·巷伯》：“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在《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中曾用此语咒骂支持学潮的女师大教员。参看本卷第181页注〔8〕。

[58]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2月1日《语丝》周刊第六十四期。

本文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如下：“今天到东城去教书，在新潮社看见陈源教授的信，在北京大学门口看见《现代评论》，那《闲话》里正议论着章士钊的《甲寅》，说‘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可见做时事文章的人官实在是做不得的，……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时做官僚，……’这么一来，我上文的‘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云云，就又有了‘放冷箭’的嫌疑了。现在特地声明：我原先是不过就一般而言，如果陈教授觉得痛了，那是中了流弹。要我在‘至今还没有完’之后，加一句‘如陈源等辈就是’，自然也可以。至于‘顺我者“通”’的通字，却是此刻所改的，那根据就在章士钊之曾称陈源为‘通品’。别人的褒奖，本不应拿来讥笑本人，然而陈源现就用着‘土匪’的字样。有一回的《闲话》（《现代评论》五十）道：‘我们中国的批评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在地上找寻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按照他这回的慷慨激昂例，如果要免于‘卑劣’且有‘半分人气’，是早应该说明谁是土匪，积案怎样，谁是剽窃，证据如何的。现在倘有记得那括弧中的‘思想界的权威’六字，即曾见于《民报副刊》广告上的我的姓名之上，就知道这位陈源教授的‘人气’有几多。

“从此，我就以别人所说的‘东吉祥派’、‘正人君子’、‘通品’等字样，加于陈源之上了，这回是用了一个‘通’字；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还有，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但对于没有这样举动的人，我却不肯先动手；而且也以文字为限，‘捏造事实’和‘散布“流言”’的鬼蜮的长技，自信至今还不屑为。在马弁们的眼里虽然是‘土匪’，然而‘盗亦有道’的。记起一件别的事来了。前几天九校‘索薪’的时候，我也当作一个代表，因此很会见了几个前‘公理维持会’即‘女大后援会’中人。幸而他们倒并不将我捆送三贝子花园或运入深山，‘投畀豺虎’，也没有实行‘割席’，将板凳锯开。终于‘学官’‘学匪’，都化为‘学丐’，同聚一堂，大讨其欠账，——自然是讨不来。记得有一个洋鬼子说过：中国先是官国，后来是土匪国，将来是乞丐国。单就学界而论，似乎很有点上这轨道了。想来一定有些人要后悔，去年竟抱了‘有奶不是娘’主义，来反对章士钊的罢。一月二十五日东壁灯下写。”

[59] 《国魂》 国家主义派所办的一种旬刊，1925年10月在北京创刊，次年1月改为周刊。该刊第九期（1925年12月30日）载有姜华的《学匪与学阀》一文，主要意思是煽动北京的学生起来打倒马裕藻一派的所谓“学匪”（按马裕藻是当时反对章士钊、杨荫榆的女师大教员之一）；但也故作公正地小骂了章士钊几句。这里说到《京报副刊》，是因为1926年1月10日该刊载有何曾亮（即周作人）驳斥姜华的《国魂之学匪观》一文。

[60] 汉朝选用人材的制度中，有推举“孝子”和“廉士”做官的办法，因此社会上产生了许多虚伪矫情的事情。《太平御览》卷四一一引刘向《孝子图》记郭巨埋儿的事说：“郭巨，河内温人。甚富，父没，分财二千万为两，分与两弟，己独取母供养。……妻产男，虑养之则妨供养，乃令妻抱儿，欲掘地埋之。于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铁券云：‘赐孝子郭巨。’……遂得兼养儿。”又卷四八二引干宝《搜神记》记丁兰刻木的事说：“丁兰，河内野王人。年十五，丧母，乃刻木作母事之，供养如生。邻人有所借，木母颜和则与，不和不与。后邻人忿兰，盗斫木母，应刀血出。兰乃殡殓，报仇。汉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61] 理学 亦称道学，即宋代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当时那些理学家在服装上也往往和一般人不同，如《程氏外书》记程颐的服装说：“先生常服茧袍，高帽檐劣半寸，系绦。曰：此野人之服也。”

[62] 帖括 科举考试文体之名。唐代考试制度，明经科以“帖经”试士。《文献通考·选举二》：“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裁纸为帖。”后考生因帖经难记，就总括经文编成歌诀，叫帖括。后世因称科举应试的文章为帖括；这里是指清代的制义，即八股文。“且夫”、“然则”，是这一类文字中的滥调。

[63] 源增 姓谷，山东文登人，北京大学法文系学生。1926年1月20日《国民新报副刊》载有他翻译的《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一文，这里的引文即见于该文译后记中。

[64] 《双官诰》 戏曲名。明代杨善之著有传奇《双官诰》。后来京剧中也有此剧，内容是：薛广出外经商，讹传已死，他的第二妾王春娥守节抚养儿子薛倚。后来薛广做了高官回家，薛倚也及第还乡，由此王春娥便得了双重的官诰。京剧《三娘教子》亦演此故事。

[65] 《四杰村》 京剧名。故事出自清代无名氏著《绿牡丹》。内容是：骆宏勋被历城县知县贺世赖诬为强盗，在解往京城途中，又被四杰村恶霸朱氏兄弟将囚车夺去，欲加杀害，幸为几个绿林好汉救出，并放火烧了四杰村。

[66] 刘玄德（161—223） 名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人，三国时在西蜀称帝。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以他作为主要人物之一。宋公明，长篇小说《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宋江，其原型是北宋末山东一带农民起义的领袖。

[67] 李景林（1884—1931） 字芳岑，河北枣强人，奉系军阀，曾任直隶保安司令兼直隶省长等职。1925年冬，奉军郭松龄倒戈与张作霖作战，冯玉祥国民军也乘机对李景林发动攻击，占领天津。李逃匿租界，后于1926年1月到济南收拾残部，与张宗昌联合，组成直鲁联军，任副总司令，伺机反攻。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就是这时发表的。

[68] “整顿学风” 1925年8月25日，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通过章士钊草拟的“整顿学风令”，并由执政府明令发表。参看本卷第128页注〔4〕。

[69] 顺我者“通” 这是对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讽刺。参看本卷第6页注〔5〕。

[70] “减膳”执政 指段祺瑞。1925年5月，北京学生因章士钊禁止纪念“五七”国耻，于9日向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提出罢免章士钊的要求；章即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段，于十一日向段祺瑞辞职，并在辞呈中向段献媚说：“钊诚举措失当。众怒齐撄。一人之祸福安危。自不足计。万一钧座因而减膳。时局为之不宁。……钊有百身。亦何能赎。”

[71] 1925年11月28日，北京群众为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举行游行示威，提出“驱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钊”等口号，章士钊即避居天津。

[72] 《甲寅》 指《甲寅》周刊。参看本卷第121页注〔3〕。

[73]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2月2日《国民新报副刊》。

[74] “异端” 语出《论语·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75] “用夷变夏” 语出《孟子·滕文公（上）》：“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里指用外来文化同化中国的意思。夷，古人对少数民族或外国的蔑称；夏，即华夏，中国或中华民族的古称。

[76] 吴稚晖（1865—1953） 名敬恒，江苏武进人。他原是清末举人，曾先后留学日本、英国。1905年参加同盟会，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等职。

[77] 这里的引文都见于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七号（1926年1月16日）发表的《再答稚晖先生》，其中说：“先生近用讲话体为文。纵笔所之。辄万数千言。其貌与黄口小儿所作若同。而其神则非读破几百卷书者。不能道得只字。”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九期（1926年1月23日）的《闲话》中，特别将这一段引出，说“很有趣”，并说吴稚晖三十岁前在南菁书院把那里的书“都看了一遍”，而“近十年随便涉览和参考的汉文书籍至少总可以抵得三四个区区的毕生所读的线装书”。以此来为章士钊的文章作证。这里所说“竟又会有‘肉麻当有趣’，述说得津津有味的”，即指陈西滢的这番话。

[78] “束发小生” 章士钊轻蔑青年学生的用语。参看本卷第118页注〔28〕。

[79]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夏，我国留日自费学生九人，志愿入成城学校（相当于士官预备学校）肄业；由于清政府对陆军学生顾忌很大，所以驻日公使蔡钧坚决拒绝保送。当时有留日学生二十余人（吴稚晖在内）前往公使馆代为交涉，蔡钧始终不允，双方因而发生争吵。

[80] “下意识”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九期（1926年1月23日）发表的《闲话》中谈到吴稚晖时说：“他自己也说过：‘我的脑筋极新，我的手段极旧’。……要是这句话还不能表示实在的情形，那么我们只好采用心理学的名词，说他的意识极新，下意识极旧，意识是西洋的物质主义者，下意识却是纯粹中国的儒者。”

[81] “不朽之大业” 语出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82] 二九二五年 陶孟和曾说，他有一部“要到二〇二五年才可以发表”的著作。参看本卷第209页注〔33〕。

[83]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九期（1926年1月23日）的《闲话》中为章士钊和他所主办的《甲寅》周刊吹嘘并讥讽鲁迅说：“自从孤桐先生下台之后，《甲寅》虽然还没有恢复十年前的精神，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可见做时事文章的人官实在是做不得的，至少做了官还是不论时事的好。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时做官僚，官僚也同时可以做‘青年叛徒的领袖’，可是这也得需要特别的天才，不是人人能干的事业，总之，孤桐先生还没有这样的才具。……近来可渐渐的不同了，时评和论文里的讽趣，好像一阵新鲜空气，把《甲寅》吹得有些苏甦了。”接着他便举章士钊在《甲寅》周刊发表的《再答稚晖先生》来作为这“有了生气”的例证。

[84]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这是《韩非子·难势》中的一个寓言：“人有鬻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85] 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七号（1925年11月7日）发表《再疏解义》一文，借评述1925年7月美国田纳西州小学教员师科布因讲授进化论被控的事，为他自己的种种“开倒车”的言行辩解。参看本卷第156页注〔15〕。按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七号（1925年8月29日）先已发表过一篇《说》，其中说：“者还也。车相避也。相避者又非徒相避也。乃乍还以通其道。旋乃复进也。……今谚有所谓开倒车者。时人谈及。以谓有背进化之通义。辄大病之。是全不明夫义者也。”

[86]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2月25日《莽原》半月刊第四期。

[87] 袁世凯 参看本卷第115页注〔11〕。袁在复辟帝制的阴谋活动中，曾指使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所谓“六君子”于1915年8月组织筹安会，公开鼓吹帝制，遭到国人强烈反对。所以这里说袁世凯“用得不大巧”。

[88] Schopenhauer 叔本华。下文的《Parerga und Paralipomena》（《副业和补遗》），叔本华1851年出版的一本杂文集。

[89] “Keep your distance！” 英语：“保持你的距离！”即不要太亲近的意思。

[90] “礼不下庶人”和下文的“刑不上大夫”二句，见《礼记·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上不大夫，刑人不在君侧。”

[9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2月8日《语丝》周刊第六十五期。

[92] 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章士钊在《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中诬蔑女学生“不受检制。竟体忘形。啸聚男生。蔑视长上。”这期间陈西滢也曾在口头上侮辱女学生。而徐志摩在1926年1月13日《晨报副刊》发表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却恭维陈说：“西滢是分明私淑法朗士的，也不止写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这就引起岂明（周作人）在同月20日《晨报副刊》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一文，针对徐志摩说陈西滢“忠贞”于女性一点，揭发了陈侮辱女学生的话：“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于是在1月30日《晨报副刊》上就发表有徐志摩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和陈西滢《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共同对鲁迅进行攻击和诽谤。在陈西滢的《几封信》中有两封《致岂明》的信，其中他自己承认“疑心先生骂的有我在里面”，一面又加以辩解，并且一再说“先生兄弟两位”或“令兄鲁迅先生”，把鲁迅也拉在一起。此外，在他的这《几封信》中还有一封题为《致志摩》的长信，内容全是对鲁迅的诋毁，因此鲁迅写了这篇文章。

[93] 新潮社 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和教员组织的社团。1918年11月成立。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周作人、叶绍钧等，曾出版《新潮》月刊（1919年1月创刊，1922年3月出至三卷二期停刊）及《新潮丛书》、《新潮社文艺丛书》。后来，由于主要成员的变化，于1927年解体。

[94] 指陈西滢给岂明的两封信中的第一信。参看本卷第223页注〔1〕。

[95] “暗中挑剔风潮” 陈西滢攻击鲁迅等人的一句不通的话。参看本卷第85页注〔8〕。

[96] “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 这是李四光给《晨报副刊》编者徐志摩的信中所说的话。详见本篇注〔23〕。

[97] “耳食之言” 即传闻的话。语出《史记·六国年表序》：“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

[98] 汪原放先生“已作古人”一案 鲁迅在1924年1月28日《晨报副刊》上发表《望勿“纠正”》一文。其中说古书的标点者“汪原放君已经成了古人了”。后知汪还健在，1925年9月24日在将该文编入《热风》时，特于篇末作了订正。汪原放，参看本卷第323页注〔6〕。

[99] “刑名师爷” 清代官署中承办刑事判牍的幕僚。他们善于舞文弄法，往往能左右人的祸福。当时绍兴籍的幕僚较多，因有“绍兴师爷”之称。陈西滢曾在《致志摩》中攻击鲁迅“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

[100] “察见渊鱼者不祥” 语出《列子·说符》：“周谚有言：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察见渊鱼，比喻窥见别人心中的“隐匿”；不祥，是指容易招来猜忌和祸患。

[101] 学理和事实 这是陈西滢自我标榜的话。参看本卷第183页注〔16〕。

[102] “笑吟吟”的天才的讽刺 这是对徐志摩称赞陈西滢的话所作的概括。参看本书《有趣的消息》及其注〔17〕。

[103] 毛厕 这是陈西滢在1925年5月30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发表的《闲话》中诬蔑女师大的话。参看本卷第85页注〔10〕。

[104] “人气” 岂明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里曾针对陈西滢侮辱女学生的话说：“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恬然自居于正人之列。”陈西滢随即在《致岂明》中加以辩解，其中有“如果先生还有半分‘人气’”这样的话。

[105] 发热 陈西滢在《致志摩》的末尾说：“昨晚因为写另一篇文章，睡迟了，今天似乎有些发热。今天写了这封信，已经疲乏了。”

[106] “逼死” 1925年10月1日，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当天他就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文内说到陈西滢本来是最厌恶副刊的；但“为要处死副刊”，反而赞成徐志摩来编《晨报副刊》，以便“第一步逼死别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从此人类可永免副刊的灾殃”。

[107] 赵子昂（1254—1322） 名孟頫，字子昂，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元代书画家，以画马著称。关于他画马的故事，清代吴升《大观录》卷十六王穉登题赵孟頫《浴马图卷》中有这样的记载：“（赵孟頫）尝据床学马滚尘状，管夫人自牖中窥之，政见一匹滚尘马。”

[108] “悻悻的狗” 陈西滢在《致志摩》中攻击鲁迅说：“说起画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报副刊》里林玉堂先生画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不过林先生的打叭儿狗的想像好像差一点。我以为最好的想像是鲁迅先生张着嘴立在泥潭中，后面立着一群悻悻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不是俗语吗？”

[109] “重女轻男”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八期（1925年8月29日）的《闲话》中谈到女师大风潮时说：“现在一部分报纸的篇幅，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

[110] 法兰斯 通译法朗士。参看本卷第70页注〔13〕。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七、五十八期（1926年1月9日、16日）连续发表两篇谈法朗士的《闲话》；徐志摩看到第一篇后，便在1月13日《晨报副刊》发表《“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称赞陈的文章和法朗士的文章同样“妩媚”，又说他学法朗士已经“有根”了。参看本书《无花的蔷薇》第七节。

[111] 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后收入《坟》。

[112] 刀笔吏 古代书吏在办理文书时，经常要使用刀和笔两种工具（用笔写在竹简或木札上，有误则用刀削去），所以秦汉时的书吏被称为刀笔吏；后来成为对舞文弄法的讼师的通称。陈西滢曾在《致志摩》中攻击鲁迅为“刀笔吏”。

[113] 李四光在1926年2月1日《晨报副刊》发表一封给徐志摩的信，内容是关于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一事的声明。信末说：“我听说鲁迅先生是当代比较有希望的文士……暗中希望有一天他自己查清事实，知道天下人不尽像鲁迅先生的镜子里照出来的模样。到那个时候，也许这个小小的动机，可以促鲁迅先生作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也许中国因此可以产生一个真正的文士。”

[114] “粪车” 陈西滢在《致志摩》中说，他发表这几封信，“总算是半年来朝晚被人攻击的一点回响，也可以证明我的容忍还没有到家。……现在忍不住的爆发了。譬如在一条又长又狭的胡同里，你的车跟着一辆粪车在慢慢的走，你虽然掩住了口鼻，还少不得心中要作恶，一到空旷的地方，你少不得唾两口口涎，呼两口气。我现在的情景正是那样。”

[115] “思想界的权威者” 1925年8月初，北京《民报》在《京报》、《晨报》刊登广告，宣传该报的“十二大特色”，其中之一为“增加副刊”，其中有“本报自8月5日起增加副刊一张，专登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等语。

[116] 秋士（孙伏园）在1924年1月12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关于鲁迅先生》一文中说：“鲁迅先生所以对于《呐喊》再版迟迟不准许的原因有数端。一，听说有几个中学堂的教师竟在那里用《呐喊》做课本，甚至有给高小学生读的。这是他所极不愿意的。最不愿意的是竟有人给小孩读《狂人日记》。……他说他虽然悲观，但到今日的中小学生长大了的时代，也许不至于‘吃人’了，那么这种凶险的印象给他们做什么！他说他一听到《呐喊》在那儿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它绝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这一类小说的必要。”

[117] “请君入瓮” 唐代酷吏周兴的故事。《资治通鉴》唐则天后天授二年载：“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勣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服罪。”

[118] 《音乐》 即《“音乐”？》，原载《语丝》第五期（1924年12月15日），后收入《集外集》；系针对《语丝》第三期（1924年12月1日）徐志摩在他翻译的波特莱尔《死尸》一诗前所发的议论而作。

[119] 陈西滢在《致志摩》中说：“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几次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

[120] “暂署佥事” 1926年1月17日，教育部令鲁迅复佥事职。因为由教育部呈请北洋政府核准的命令在当时还未发表，所以是“暂署佥事”。后于3月31日国务总理费德耀“训令”教育部执行。

[121]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期（1925年11月21日）的《闲话》里，说当时著述界盛行“剽窃”或“抄袭”，含沙射影地诬蔑作者说：“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在《致志摩》里，他便明白地说作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下文的“回敬他一通骂街”，参看本卷第223页注〔1〕。

[122] 盐谷氏 指盐谷温（1878—1962），日本汉文学研究者，当时任东京大学教授。

[123] 《红楼梦》 长篇小说，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清代曹雪芹作，后四十回一般认为高鹗续作。

[124] 森槐南（1863—1911） 日本汉文学研究者。他对唐人小说的分类，据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所述，共为三类：一、别传；二、异闻琐语；三、杂事。盐谷温则根据他所分类的第一类，再细分为别传、剑侠、艳情、神怪四种。

[125] 《汉魏丛书》 明代何镗辑，内收汉魏六朝间遗书百种。现在通行的有清代王谟刻本八十六种。

[126] 指《古小说钩沉》。内收自周至隋散佚小说三十六种，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的重要资料。

[127] 《唐人说荟》 小说笔记丛书，共二十卷。旧有桃源居士辑本，凡一百四十四种；清代乾隆时山阴陈莲塘又从《说郛》等书中采入二十种，合为一百六十四种。内多小说，但删节和谬误很多，坊刻本又改名为《唐代丛书》。

[128] 《太平广记》 类书，共五百卷。宋代李昉等奉敕纂辑。书成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内收六朝至宋代初年的小说、野史很多，引用书四百七十余种。

[129] 塞文狄斯 通译塞万提斯。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1925年11月7日）的《闲话》里说：“有人游历西班牙，他的引导指了一个乞丐似的老人说，那就是写Don Quixote的Cervantes（按即写《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听者惊诧道：塞文狄斯么？怎样你们的政府让他这样的穷困？引导者道：要是政府养了他，他就不写Don Quixote那样的作品了。”按在英国华兹（H.E.Watts）所著的《塞万提斯评传》第十二章中，曾说及西班牙人托勒斯（M.Torres）所记述的一个故事：1615年2月，托勒斯会见一些喜爱塞万提斯著作的法国人，他愿意引导他们去看那个作者。他告诉他们说，塞万提斯年老了，很穷；于是一个人问道：西班牙为什么不用公款资助这样的人，使他富有些呢？又一个人说道：若是穷困逼迫他著书，那么愿上帝不要使他富有，他自己虽穷困，却可以用他的著作使世界富有。但托勒斯并未真的引导那些法国人去见塞万提斯。陈西滢关于塞万提斯的话是道听途说。“四书”合成于南宋，参看本卷第39页注〔6〕。陈西滢曾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增刊》（1926年1月1日）发表的《做学问的工具》中称要研究汉代人的“四书”注疏理论。参看本书《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第二节。

[130] 陈西滢在凌叔华的抄袭行为被揭发以后，曾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期的《闲话》里隐约地为她辩解说：“至于文学，界限就不能这样的分明了。许多情感是人类所共有的，他们情之所至，发为诗歌，也免不了有许多共同之点。……难道一定要说谁抄袭了谁才称心吗？”“‘剽窃’‘抄袭’的罪名，在文学里，我以为只可以压倒一般蠢才，却不能损伤天才作家的。……至于伟大的天才，有几个不偶然的剽窃？不用说广义的他们心灵受了过去大作家的陶养，头脑里充满了过去大作家的思想，就狭义的说，举起例来也举不胜举。”

[131] 指陈彬龢的节译本，1926年3月朴社出版（以后另有孙俍工的全译本，开明书店出版）。

[132] 沫若 即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史学家，创造社主要成员。1925年初曾有人揭发欧阳兰抄袭郭沫若所译的雪莱诗，参看本卷第84页注〔6〕。

[133] 关于凌叔华剽窃小说图画的问题，《晨报副刊》自1925年10月1日起，由徐志摩主编，报头用了一幅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黑白画像，无署名，徐志摩在开场白《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中也未声明画的来源；只是在同日刊载的凌叔华所作小说《中秋晚》后的附记中，顺便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10月8日，《京报副刊》上登载了署名重余（陈学昭）的《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指出该画是剽窃英国画家琵亚词侣的。不久，《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1925年11月7日）发表了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11月14日《京报副刊》又发表了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一则，暗指凌叔华的《花之寺》说：“挽近文学界抄袭手段日愈发达，……现在某女士竟把柴霍甫的《在消夏别墅》抄窜来了。……这样换汤不换药的小说，瞒得过世人的吗？”陈西滢疑心这两篇文章都是鲁迅所作。凌叔华（1904—1990），名瑞棠，笔名淑华，广东番禺人，小说家。陈西滢之妻。下文的琵亚词侣，又译毕亚兹莱（A.Beardsley，1872—1898），英国画家。多用图案性的黑白线条描绘社会生活。鲁迅曾于1929年选印他的画集《比亚兹莱画选》（《艺苑朝华》第四辑）。

[134] 曹锟贿选 参看本卷第69页注〔8〕。

[135] 彭允彝 参看本卷第169页注〔6〕。“代表无耻”，是当时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抨击他的话（1923年1月28日《努力》周报第三十九期）：“彭允彝是不能不去的，这一个无耻政客本不值得教育界全体的攻击，……彭允彝代表‘无耻’。”1925年8月，北京大学反对章士钊为教育总长，也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北大十七教授在《致本校同事公函》中，曾说章士钊“是彭允彝一样的无耻政客”。另周作人在1926年1月9日《京报副刊》发表的《八千元》（署名何曾亮）一文中亦称“章（士钊）刘（百昭）这些东西本是代表无耻者”。

[136] 云南起义 蔡锷等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在云南组织护国军，于1915年12月25日发动讨袁起义，很快得到全国各省的响应，袁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

[137] 国民军 当时冯玉祥统率的倾向进步的军队。冯原属北洋军阀中直系吴佩孚的一系；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在前线与奉军妥协，通电主张停战，回师北京，举行“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并将所部军队改组为国民军。

[138] 张勋复辟 张勋（1854—1923），字绍轩，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之一，时任安徽督军。1917年6月，他带兵五千从徐州到北京，7月1日与康有为等拥清废帝溥仪进行复辟。同月12日即告失败。作者于7月3日与教育部几个部员同时愤而离职，乱平后于16日返部。

[139] 炸大 形容出国留学“镀金”后身价百倍。刘半农在《奉答陈通伯先生兼答SSS君及其前辈》（1926年2月1日《语丝》第六十四期）中说：“吴稚晖先生说过，留学生好比是面筋，到西洋那大油锅里去一泡，马上就蓬蓬勃勃涨得其大无外。”

[140] “教训” 陈西滢在《致岂明》的第二封信中兼指鲁迅说：“因为先生们太不自量，更加得意忘形起来，所以给先生一个小小的教训。”

[14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2月7日北京《京报副刊》。

[142] “攻周专号” 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的全部篇幅，只刊载徐志摩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和陈源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所以2月2日《京报副刊》上发表署名杨丹初的《问陈源》一文中，称它为“陈源同徐志摩两个人凑成的攻周的专号”。

[143] “带住” 1926年2月3日《晨报副刊》以“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为题，发表了李四光和徐志摩的通信。李四光在通信中说鲁迅“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他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弄到人家无故受累，他也管不着。”同时他又慨叹“指导青年的人，还要彼此辱骂，制成一个恶劣的社会”。徐志摩则说：“大学的教授们”，“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是不该这样“混斗”的。因为“这不仅是绅士不绅士的问题，这是像受教育人不像的问题。……学生们看做他们先生的这样丢丑，忍不住开口说话了。绝对没关系人看了这情形也不耐烦了。”“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带住！”

[144]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八期（1925年4月11日）《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和同刊第二卷第四十八期（1925年11月7日）的《闲话》中，曾一再说到1921年夏天他在伦敦访问萧伯纳的事。

[145] 李四光的“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话，参看本卷第252页注〔23〕。李四光是当时“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成员之一。

[146] 勃罗亚（L.Bloy，1846—1917） 法国作家，著有《一个专事拆毁的工程师的话》、《失望者》等。他常在文章中用极端的语言攻击当时文学界和新闻界的著名人物。

[147] 指王世杰，他也是“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后改名“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的成员。他曾说“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实属违法，应加以否认”。对此，鲁迅指出：“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的么？使之何以为情？”（见《华盖集·“公理”的把戏》）

[148] 指本书《不是信》一文。

[149] 徐志摩在1926年1月20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中说：“我真的觉得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除外你自己专骂旁人的。……我们心里的心里，你要是有胆量望里看的话，那一种可能的恶、孽、罪，不曾犯过？谁也不能比谁强得了多少，老实说。……引申这个意义，我们就可以懂得罗曼罗兰‘Above the Battle-field’的喊声。鬼是可怕的；他不仅附在你敌人的身上，那是你瞅得见的，他也附在你自己的身上，这你往往看不到。要打鬼的话，你就得连你自己身上的一起打了去，才是公平。”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剧本《爱与死的搏斗》等。“Above the Battlefield”，英语，意为“在战场上”；这是徐志摩对罗曼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文集《超乎混战之上》一书书名不准确的英译。

[150]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2月11日《国民新报副刊》。

[151] 灶君 即灶神。《礼记·礼器》唐代孔颖达疏：“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又晋代葛洪《抱朴子·微旨》：“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旧俗以夏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为灶神升天的日子，在这一天或前一天祭送灶神，称为送灶。

[152] 食蛤蜊 见《南史·王弘传》：“（融）初为司徒法曹，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识。昭略屡顾盼，谓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谓曰：‘仆出于扶桑，入于汤谷，照耀天下，谁云不知，而卿此问！’昭略云：‘不知许事，且食蛤蜊。’”谈风月，见《梁书·徐勉传》，勉为吏部尚书，“常与门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酒酣耳热而歌呜呜”，语出《汉书·杨恽传》，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呜呜。”

[153] “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这是明代周道登（崇祯初年的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对崇祯皇帝说的话，见竹坞遗民（文秉）著《烈皇小识》卷一：“上（崇祯）又问阁臣：‘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周道登对曰：‘情面者，面情之谓也。’左右皆匿笑。”

[154] “兵谏”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政府在参战问题上，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发生分歧。5月，段提出的对德宣战案未得国会通过，且被黎元洪免职。于是在段的指使下，安徽省长倪嗣冲首先通电独立，奉、鲁、闽、豫、浙、陕、直等省督军相继响应，皖督张勋也用“十三省省区联合会”（即所谓督军团）的名义电请黎元洪退职，他们自称这种行动为“兵谏”。

[155] “三尸神” 道教称在人体内作祟的“神”。据《太上三尸中经》说：“上尸名彭倨，在人头中；中尸名彭质，在人腹中；下尸名彭矫，在人足中。”又说每逢庚申那天，三尸神便上天去向天帝陈说人的罪恶；但只要人们“守庚申”，即在这天晚上通宵不眠，便可避免。

[156] 《封神传演义》 即《封神演义》，长篇小说，明代许仲琳（一说陆西星）著，共一百回。

[157]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3月9日《国民新报副刊》。

[158] “挟天子以令诸侯” 语出《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在隆中对刘备评论曹操时说：“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

[159] “普天之下，莫非皇土” 语出《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春秋左传》昭公七年引此诗“溥”作“普”。

[160]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 语出《梁书·邵陵王纶传》。太清三年（549）三月，侯景陷建康，“高祖（梁武帝萧衍）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161] “我生不有命在天” 语出《尚书·西北戡黎》：“王（商纣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162] “射天” 见《史记·殷本纪》：“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仰）而射之，命曰‘射天’。”

[163]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3月8日《语丝》周刊第六十九期。

[164] Schopenhauer 叔本华。这里的引文据1916年德文版《叔本华全集》第六卷《比喻·隐喻和寓言》，可译为：“没有无刺的蔷薇。——但不是蔷薇的刺却很多。”

[165] 《女人论》 即《妇人论》，叔本华关于妇女的一篇文章。参看本卷第173页注〔9〕。

[166] “放冷箭者” 陈西滢在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攻击鲁迅说：“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

[167] 蔡孑民（1868—1940） 名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近代教育家。1904年与章太炎等组织光复会，任会长，1905年参加同盟会。历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五四”时期，他赞成和支持新文化运动。1926年2月3日，他由欧洲回抵上海，对国闻社记者发表关于国内政治教育等问题的谈话，说“对政制赞可联省自治。对学生界现象极不满。谓现实问题，固应解决，尤须有人埋头研究，以规将来”等等（见1926年2月5日北京《晨报》），这与胡适的主张相似，鲁迅在这里说“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是对蔡的一种比较委婉的批评。

[168] 此段文字引自徐志摩在1925年10月31日《晨报副刊》发表的《罗曼罗兰》一文。文中说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教授卡立大斯拉格（Kalidas Nag）“专为法国罗曼罗兰明年六十整寿征文”写信给他，说“罗曼罗兰先生自己极想望从‘新中国’听到他思想的回响”。

[169] 此段引自徐志摩在1926年1月13日《晨报副刊》发表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

[170] 此段引自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三期（1926年2月20日）发表的《闲话》。

[171] 此段引自徐志摩在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

[172] 此段引自陈西滢的《致志摩》。

[173]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3月29日《语丝》周刊第七十二期。

[174] 勃尔根 当时英国的印度内务部部长。这里引的是他在伦敦中央亚洲协会演说中的话（见1925年7月2日《京报》）。

[175] 叔梁纥 春秋时鲁国人，孔子的父亲。按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比耶稣生年早五百多年。

[176] 关于《现代评论》收受津贴一事，《猛进》周刊第三十一期（1925年10月2日）曾有一篇署名蔚麟的通信，其中说：“《现代评论》因为受了段祺瑞、章士钊的几千块钱，吃着人的嘴软，拿着人的手软，对于段祺瑞、章士钊的一切胡作非为，绝不敢说半个不字。”又章川岛在《语丝》第六十八期（1926年3月1日）的一篇通信里也曾说到这津贴问题：“据说现代评论社开办时，确曾由章士钊经手弄到一千元，大概不是章士钊自己掏腰包的，来路我也不明。……然而这也许是流言，正如西滢之捧章士钊是否由于大洋，我概不确知。”这两篇通信都揭露了当时《现代评论》收受津贴的事实；对于这两篇通信，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五期（1926年3月6日）的《闲话》里曾经加以辩解，说他个人并未“每月领到三千元”，只要有人能够证明他“领受过三百元，三十元，三元，三毛，甚而至于三个铜子”，那他“就不再说话”。但对于《现代评论》收受过段祺瑞津贴的事实，则避而不答。又，这里的“联合战线”一语，最初出自《莽原》周刊第二十期（1925年9月4日）霉江致鲁迅的信中：“我今天上午着手草《联合战线》一文，致猛进社、语丝社、莽原社同人及全国的叛徒们的，目的是将三社同人及其他同志联合起来，印行一种刊物，注全力进攻我们本阶级的恶势力的代表：一系反动派的章士钊的《甲寅》，一系与反动派朋比为奸的《现代评论》。”

[177] 这是陈西滢的话，参看本卷第230页注〔11〕。

[178] 指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在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李景林等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因见奉军战事失利，便公开出面援助，于12日以军舰两艘驶进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国民军亦开炮还击，于是日本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于3月16日以八国名义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等等，并限于四十八小时以内答复，否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所认为必要之手段”。北京各界民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于3月18日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不料在国务院门前，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当场和事后因重伤而死者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造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屠杀中国民众的大惨案。

[179] 1905年1月22日（俄历一月九日），彼得堡工人因反对开除工人和要求改善生活，带着眷属到冬宫请愿；俄皇尼古拉二世却命令士兵开枪。结果，有一千多人被击毙，两千多人受伤。这天是星期日，史称“流血的星期日”。

[180] “子孙绳绳” 语出《诗经·大雅·抑》：“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绳绳，相承不绝的样子。

[18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3月30日《国民新报副刊》。

[182] 言语道断 佛家语。《璎珞经》：“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原意是不可言说，这里表示悲愤到无话可说。

[183] 死地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3月20日《晨报》“时论”栏发表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诬称爱国青年“激于意气，挺（铤）而走险，乃陷入奸人居间利用之彀中”，指责徐谦等“驱千百珍贵青年为孤注一掷……必欲置千百珍贵青年于死地”，同时该文还攻击“共产派诸君故杀青年，希图利己”。3月22日，《晨报》又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说：“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按即他所谓“群众领袖”）之手”。

[184] “没齿而无怨言” 语出《论语·宪问》：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没齿，终身之意。

[185] 《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 《爱与死的搏斗》，罗曼罗兰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剧本之一，作于1924年。其中有这样的情节：国约议会议员库尔跋齐因反对罗伯斯庇尔捕杀丹东，在议会投票判决丹东死刑时，他放弃投票，并中途退出会场；同时他的妻子又在家中接待一个被通缉的吉隆德派分子（她的情人），被人告发。他的朋友政治委员会委员加尔来到他家，告以委员会要他公开宣布对被通缉者的态度；在他拒绝以后，加尔便给予两张事先准备好的假名假姓的护照，劝他带着妻子一同逃走，并告诉他已得到罗伯斯庇尔的默许。鲁迅这里所举的是加尔在这时候对库尔跋齐所说的话。

[186]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3月28日《京报副刊》。

[187] 三一八惨案死伤应为二百多人。参看本卷第281页注〔6〕。

[188] “康党” 指清末参加和赞同康有为等变法维新的人。

[189] “革党” 指参加和赞同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统治的民主革命运动的人。

[190] “乱党” 1913年，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战争（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就把国民党作为“乱党”取缔。

[191] 深文周纳 歪曲或苛刻地援用法律条文，罗织罪名，陷人于罪。《汉书·路温舒传》：“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纳）之。”

[192] “整顿学风” 指1926年3月6日，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致电执政段祺瑞和总理贾德耀，说当时“学风日窳，士习日偷……现已（男女）合校，复欲共妻”，“江窃以为中国之可虑者，不在内忧，不在外患，惟此邪说诐行，甚于洪水猛兽。”请段祺瑞“设法抑制”，“整顿学风”。段祺瑞接到电报后，除令秘书长章士钊复电“嘉许”外，并将原电通知国务院，责成教育部会同军警机关，切实整顿学风。去年的“整顿学风”，参看本卷第128页注〔4〕。

[193] 通缉令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徐谦等五人，说他们“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徐谦等并着京内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徐谦（1871—1940），字季龙，安徽歙县人。李大钊（1889—1927），参看本卷第69页注〔9〕。李煜瀛（1881—1973），字石曾，河北高阳人。易培基（1880—1973），字寅村，湖南长沙人。顾兆熊（1888—1972），字孟余，河北宛平（今属北京）人。

[194] 清室善后委员会 1924年11月冯玉祥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后，北洋政府为办理清室善后事宜和接收故宫文物而设的机构。

[195] 俄款委员会 即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发表《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这里所说的三个委员，即李煜瀛、徐谦、顾兆熊。

[196] “优美的差缺” 这是引用陈西滢的话。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五期（1926年3月6日）的《闲话》里说：“在北京学界一年来的几次风潮中，一部分强有力者的手段和意见，常常不为另一部分人所赞同，这一部分强有力者就加不赞成他们的人们一个‘捧章’的头衔。然而这成了问题了。……不‘捧章’而捧反章者，既然可以得到许多优美的差缺，而且可以受好几个副刊小报的拥戴，为什么还要去‘捧章’呢？”

[197] 1926年3月26日《京报》登载消息说：“该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树人（原注：即鲁迅）、许寿裳、马裕藻……等，均包括在内。”

[198]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4月12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

[199] 刘和珍（1904—1926） 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学生。杨德群（1902—1926），湖南湘阴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预科学生。

[200] 程君 指程毅志，湖北孝感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

[201] 《莽原》 文艺刊物，鲁迅编辑，1925年4月24日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11月27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1926年1月10日改为半月刊，未名社出版。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1927年12月25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这里所说的“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指《莽原》半月刊。

[202] 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中，杨于1925年5月7日借召开“国耻纪念会”之机，强行登台做主席，但当即为全场学生的嘘声所驱赶。下午，她在西安饭店召集若干教员宴饮，策划迫害学生。9日，以评议会名义开除许广平、刘和珍、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学籍。

[203] 偏安于宗帽胡同 反对杨荫榆的女师大学生被赶出学校后，在西城宗帽胡同租赁房屋作为临时校舍，于1925年9月21日开学。当时鲁迅和部分教师曾去义务授课，表示支持。

[204] 学校恢复旧观 女师大学生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在社会进步力量的声援下，于1925年11月30日迁回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原址，宣告复校。

[205] 张静淑（1902—1978） 湖南长沙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受伤后经医治，幸得不死。

[206] 陶潜 晋代诗人。参看本卷第78页注〔5〕。这里引用的是他所作《挽歌》中的四句。

[207]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4月10日《国民新报副刊》。

[208] 贾德耀（1880—1940） 安徽合肥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当时是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国务总理兼代理陆军总长。

[209] 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 1926年3月22日，《晨报》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诬蔑徐谦等“非迫群众至国务院不可，竟捏报府院卫队业已解除武装，此行绝无危险，故一群青年始相率而往”。并说：“吾人在纠弹政府之余，又不能不诘问所谓‘群众领袖’之责任。”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1926年3月27日）评论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中，也企图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去，说他“遇见好些人”，都说“那天在天安门开会后，他们本来不打算再到执政府。因为他们听见主席宣布执政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所以又到执政府门前去瞧热闹。……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

[210] 锻炼 罗织罪名，陷人于罪。参看本卷第287页注〔6〕。

[211] 四烈士 指辛亥革命时炸袁世凯的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和炸良弼的彭家珍四人。他们合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约二里的万生园（即今北京动物园），在张、黄、彭三人的墓碑上都没有镌上一个字。圆明园在北京西直门外二十余里的海淀，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地方，1860年（清咸丰十年）被侵入北京的英法联军焚毁。三一八惨案后，被难者家属和北京一些团体、学校代表四十多人，于27日召开联席会议，由民国大学校长雷殷报告，他认为公葬地点以圆明园为宜，并说已非正式地与内务总长屈映光商议，得到允诺等。会议遂决定成立“三一八殉难烈士公葬筹备处”，并拟葬各烈士于圆明园。

[212] 许褚 三国时曹操部下名将。“赤体上阵”的故事，见小说《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清初毛宗岗《三国演义》评本，卷首有假托为金圣叹所作的序，并有“圣叹外书”字样，每回前均附加评语，通常就都把这些评语认为是金圣叹所作。金圣叹（1608—1661），名人瑞，字圣叹，江苏吴县人，明末清初文人。曾批注《水浒》、《西厢记》等书，他把所加的序文、读法和评语等称为“圣叹外书”。

[213]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4月10日《京报副刊》。

[214] 指1926年春夏间，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李景林、张宗昌所部直鲁联军在京津间的战争。当时奉系军阀称国民军为“赤化”，称他们自己对国民军的进攻为“讨赤”。

[215] 奉天飞机三临北京之空中 1926年4月，在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国民军驻守北京，奉军飞机自2日起，连续三天飞临北京投弹（作者此文写于4月6日；此后奉军飞机还曾到北京投弹数次）。奉天，辽宁省的旧称，当时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盘踞的地方。

[216] “从优拟恤” 段祺瑞执政府国务院于1926年3月20日开会后，发布“怃恤令”说：“此次徐谦等率领暴徒，实行扰乱，自属罪无可逭。惟当时群众复杂，互相攻击之时，或恐累及无辜，情属可悯。着内务部行知地方官厅，分别查明怃恤。”

[217] 两个俄款委员会委员 应为三人，参看本书《可惨与可笑》及其注〔10〕。

[218] 此段引自1926年4月5日《京报》（文中的“六日”应为“五日”）发表的《九校代表对改组俄委会意见》的新闻。九校，指当时的北京大学、工业大学、农业大学、医科大学、法政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子大学、艺术专门学校九所国立大学。引文中的胡仁源（1883—1942），浙江吴兴人，曾留学日本，1926年4月至5月任教育总长。下文的五私大，指当时北京的朝阳、民国、中国、平民、华北等五所私立大学。

[219]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5月17日《语丝》周刊第七十九期。

[220] 此段引自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一期（1926年4月17日）发表的《闲话》。他在文中先举《呐喊》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最初十年间的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接着就攻击鲁迅的杂文。

[221] 见塞万提斯著《堂吉诃德》第五、六章。关于说塞万提斯“像叫化子”的话，参看本卷第255页注〔39〕。

[222] 卫道的新闻记者，圆稳的大学校长 指成舍我、蒋梦麟等人。据1926年4月28日上海《时事新报》和同年5月1日广州《向导》周报第一五一期报道，自标榜“扑灭赤化”的奉军及直鲁联军进占北京，并采取枪毙《京报》社长邵飘萍等严厉镇压手段后，北京报界和学界一片恐慌，《世界日报》成舍我、《中美晚报》宋发祥和“素号稳健的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等均先后逃匿。蒋梦麟（1886—1964），浙江余姚人，早年留学美国，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成舍我（1898—1991），湖南湘乡人。北京《世界日报》创办者。

[223] “火炎昆冈，玉石俱焚” 语出《尚书·胤征》，好坏同归于尽的意思。昆冈，古代传说中的产玉之山。

[224] 指1920年7月北洋军阀直皖两系之间的战争。直系军阀以曹锟、吴佩孚等为首；皖系军阀以段祺瑞、徐树铮等为首。战事于7月中旬开始，不数日皖军溃败；北洋政府于7月底免去段祺瑞一切职务，并通缉徐树铮、曾毓隽、朱深、李思浩等十人。除李思浩外，其他九人都逃入日本公使馆。徐树铮（1880—1925），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直皖战争时任段祺瑞第一军参谋长。下文所说的广告，不见于《北京日报》；究系何报，未详。

[225] 伊卜生（H.Ibsen，1828—1906） 通译易卜生，挪威剧作家。主要作品有《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五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

[226]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5月31日《语丝》周刊第八十一期。

[227] 《语丝》 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1927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1930年3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主要撰稿者和支持者之一，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参看《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这里的“改成中本”，指《语丝》从八十一期起由十六开本改为二十开本。

[228] 《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四期（1926年5月8日）时事短评栏有《北京城内的外国旗》一文，作者署名“召”（燕树棠），其中说到1926年春夏间国民军与奉军作战和段祺瑞执政府崩溃期间，北京“东交民巷界线以外”有人挂外国旗的事。文中空谈“条约法律”，把依附帝国主义的军阀政客和普通民众不加区别地一概斥之为“托借外国国旗的势力”，说这是“无耻的社会心理”的表现。

[229] 红字旗 当时军阀王芝祥等用佛教慈善团体的名义所组织的世界红字会的会旗。

[230]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关于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中，谈到死难的女师大学生杨德群说：“杨女士湖南人，……平常很勤奋，开会运动种种，总不大参与。三月十八日她的学校出了一张布告，停课一日，叫学生们都去与会。杨女士还是不大愿意去，半路又回转。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卫队一放枪，杨女士也跟了大众就跑，忽见友人某女士受伤，不能行动，她回身去救护她，也中弹死。”但事实上，当日女师大并未“叫学生们都去与会”，而是学生自治会向教务处请准停课一日。《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1926年4月10日）登有女师大学生雷榆、李慧等五人给陈西滢的辩诬信，说明杨德群平时“实际参与种种爱国运动及其他妇女运动”，当日与同学们一同出校，“沿途散发传单，意气很激昂”，反驳了陈西滢的不实之词。

[231] “直接或间接用苏俄的金钱”等，是陈西滢诬蔑当时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的话。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四期发表的讨论“节育问题”的《闲话》中说：“家累日重，需要日多，才智之士，也没法可想，何况一般普通人，因此，依附军阀和依附洋人便成了许多人唯一的路径。就是有些志士，也常常未能免俗。……他们自己可以挨饿，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呵！就是那些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也何尝不是如此。”

[232] 山格夫人（M.Sanger，1879—1966） 通译山额夫人，美国人。自1914年起提倡节制生育运动，1921年创立美国节制生育联盟，并任主席。1922年4月曾来我国从事宣传。

[233] “有些志士” 指那些反对节育宣传的人。如1924年5月5日《晨报副刊》载署名怀素的《五千年之黄帝子孙从此绝矣》一文，曾引用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胡晋接的讲演辞，其中说：“最新潮流之结果，果如何乎。吾一推究之，不禁毛发森然，不寒而栗。盖其结果，乃一极凶之象，即‘家破种灭国亡’是也。”“而又有山额夫人之制育方法，制育药品，以为其助缘。此种新文化，如不能普及，则亦幸耳。多普及一人，即灭此一人之种。多普及一家，即灭此一家之种。若真普及于全国，恐五千年之黄帝子孙，从此绝矣。”

[234] 关于教育部和教育界为“苏俄的金钱”发生纠葛，1926年5月中旬，北洋政府教育部以首都教育经费困难，特向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借拨十万元，并拟将此款按照预算平均分配给北京国立大学、公立中小学、教育部及其分设机关。而当时北京大学等国立九校教职员则反对这种分配方法，认为此款只能用于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因而和教育部发生纠葛。

[235] 清末，我国北方爆发以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城市贫民为主的义和团运动。他们以设立拳坛，练习拳棒和其他迷信方式组织群众，初以“反清灭洋”为口号，后改为“扶清灭洋”，被清廷利用攻打外国使馆，焚烧教堂，1900年（庚子）被俄、德、美、英、法、日、意、奥八国联军和清政府共同镇压。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迫使清王朝于1901年9月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索取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这就是所谓“庚子赔款”。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决定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参看本卷第288页注〔10〕。

[236] 大师兄 义和团练拳，约以二十五人为一团，每团设一头领，称为大师兄。

[237]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6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

[238] 章士钊（行严）关于“二桃杀三士”的一段话，见他在1923年8月发表于上海《新闻报》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夫语以耳辨。徒资口谈。文以目辨。更贵成诵。则其取音之繁简连截。有其自然。不可强混。如园有桃。笔之于书。词义俱完。今曰此于语未合也。必曰园里有桃子树。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239] 《晏子春秋》 撰人不详。内容是记载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婴（平仲）的言行。这里所引的一段，见该书卷二《谏》下。

[240] 《梁父吟》 亦作《梁甫吟》，乐府楚调曲名。此篇系乐府古辞（旧题诸葛亮作，不确），鲁迅上文所引“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为诗中最末两句。“相国”一作“国相”。

[241] “每下愈况” 语出《庄子·知北游》。参看本卷第121页注〔5〕。

[242]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一文，发表于1923年9月14日的《晨报副刊》（署名雪之），其时编辑为孙伏园；1925年10月1日起才由徐志摩（即文中说的“诗哲”）编辑。关于“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话，参看本卷第251页注〔16〕。

[243] “睚眦之怨” 意即小小的仇恨。语出《史记·范睢传》：“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1926年4月10日）发表《杨德群女士事件》一文，以答复女师大学生雷榆等五人为三一八惨案烈士杨德群辩诬的信，其中暗指鲁迅说：“因为那‘杨女士不大愿意去’一句话，有些人在许多文章里就说我的罪状比执政府卫队还大！比军阀还凶！……不错，我曾经有一次在生气的时候揭穿过有些人的真面目，可是，难道四五十个死者的冤可以不雪，睚眦之仇却不可不报吗？”

[244] “动机”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1925年11月7日）《闲话》中说：“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作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种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年轻的人，他们观看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的，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都是混杂的。”

[245] 1926年春夏之交，冯玉祥国民军在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准备放弃北京。段祺瑞趁机阴谋与奉系军阀里应外合，赶走冯军。4月10日凌晨，驻守北京的国民军包围段宅和执政府，段闻讯后即逃往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章士钊随之也避居天津租界。

[246] 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1925年9月12日）上重新刊载他所作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前面加了一段按语，其中说：“北京报纸。屡以文中士与读书人对举。为不合情实。意谓二桃之士。乃言勇士。非读书人。此等小节。宁关谋篇本旨。且不学曰学。其理彼乃蒙然。又可哂也。”

[247] 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 这是针对章士钊的农业救国论而说的。章曾一再鼓吹“农村立国”，如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六号（1926年1月9日）发表的《农国辨》一文中说：“凡所剿袭于工国浮滥不切之诸法。不论有形无形。姑且放弃。返求诸农。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庶乎其可。”

[248]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6月7日《语丝》周刊第八十二期。

[249] 《何典》 章回体小说，又名《十一才子鬼话连篇录》，共十回。借鬼语鬼事表现社会人情世态，间用苏南方言口语，带有讽刺而流于油滑。1878年（清光绪四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编著者“过路人”原名张南庄，清代上海人，生活于乾隆、嘉庆年间；评者“缠夹二先生”原名陈得仁，清代长洲（今江苏吴县）人。1926年6月，刘复（半农）将此书标点重印，鲁迅曾为作题记（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250] 常维钧（1894—1985） 名惠，字维钧，河北宛平（今属北京）人，北京大学法文系毕业，曾任北大《歌谣》周刊编辑。

[251] 半农 刘复（1891—1934），字半农，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职。他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参看《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著有诗集《扬鞭集》、散文集《半农杂文》等。

[252] 厂甸 北京地名，位于和平门外琉璃厂。过去每年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传统的庙市期间，这里有许多临时摆设的旧书摊。

[253] 汪原放（1897—1980） 安徽绩溪人。“五四”以后，曾标点《水浒传》等小说若干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每种前大抵都有胡适（适之）所作的序。

[254] 李小峰（1897—1971） 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当时是上海北新书局主持者之一。

[255] 《何典》广告 载于《语丝》第七十至七十五期。前三期只刊登“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数语，未提《何典》书名。从七十三期（1926年4月5日）起，广告开头才是“吴稚晖先生的老师（《何典》）出版预告”，其中引用了吴稚晖的一段话：“我止读他（按指《何典》）开头两句……从此便打破了要做阳湖派古文家的迷梦，说话自由自在得多。不曾屈我做那野蛮文学家，乃我生平之幸。他那开头两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用这种精神，才能得言论的真自由，享言论的真幸福。”

[256] 1926年春夏间，由于段祺瑞政府长期不发放教育经费，国立九所大学都未能开学。北京大学在3月15日召开教职员评议会，决定如不发一个月欠薪，生活无法维持，不能开课（见1926年3月17日《京报》）。后虽勉强开学，但教员请假者日必数十。不久，教务会议即议决，提前于6月1日举行学年考试，以便早日结课。这里说的“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即指此。

[257] 陶焕卿 即陶成章。参看本卷第115页注〔10〕。

[258]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1926年7月5日、8日、10日、12日北京《世界日报副刊》。

[259] 段祺瑞曾撰《二感篇》，发表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八号（1925年11月14日），分《内感》与《外感》两篇。“内感”是对国内时局的感想；“外感”是对国际时局的感想。在《内感》篇内，他大谈封建的“道德仁义”，并语含杀机地说：“最奇特者。人之所无。而我更有澎湃之学潮。可谓新之又新。……不加裁制。胡可以安良善。郑子产曰。水懦民玩多死焉。故唐尧四凶之殛。孔子少正卯之诛。……不得已而出此。是必有故。”这里的“外冒篇”是对段祺瑞的讽刺。

[260] 李慈铭（1830—1894） 字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末文学家。室名越缦堂，所著《越缦堂日记》，系按日记述的读书札记，始于1853年，止于1889年，内容涉及经史百家及时事。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影印出版。

[261] “有厚望焉” 1926年4月中旬，段祺瑞在逃往天津前发出八道“命令”。第一道“严禁赤化”中说：“惟是共产之祸，举国非之，及今不图，何以为国，尚望各省军民长官，国内耆旧，设法消弭，勿任滋蔓，有厚望焉。”这里是顺笔对段的讽刺。

[262] 《世界日报》 成舍我主办，1925年2月1日创刊于北京。1926年6月中旬，该报请刘半农编辑副刊。据鲁迅日记，刘在6月18日访作者约稿。作者便自6月25日起为该刊写了《马上日记》等文。

[263] 八字 旧时用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来记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各得两字，合为“八字”。迷信认为根据这八个字可推算人的命运祸福。

[264] 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 指陈西滢、徐志摩等人。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症在北京协和医院诊治，由医生割去右肾后，不但血未全清，连病源也未查出。当时陈西滢为此写了两篇《闲话》（刊于5月15日、22日《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五、七十六期），徐志摩也写过一篇《我们病了怎么办？》（5月29日《晨报副刊》），一起对手术的医生加以指责和嘲讽。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七十六期的《闲话》中说：“我们朋友的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这里的“中医了不得论”，即指此类言论。

[265] 季茀 许寿裳（1883—1948），字季茀，浙江绍兴人，教育家。作者留学日本弘文学院时的同学，其后又在教育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处同事多年，与作者友情甚笃。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台湾大学任教，1948年2月18日深夜被刺杀于台北。著有《鲁迅年谱》、《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

[266] Dr.H. 指许诗堇，许寿裳兄许铭伯之子。鲁迅1926年6月19日日记：“上午，季巿、诗堇来，为立一方治胃病。”

[267] Sirup Simpel 德语：纯糖浆。

[268] Fraeulein H. 德语：H女士（即许广平）。参看本卷第389页注〔2〕。

[269] “特别国情” 这是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他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散布的一种谬论。古德诺在该年8月10日的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声称中国自有“特别国情”，“民智卑下之国，最难于建立共和”，应恢复君主政体，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这里借作对药房欺诈行为的讥讽。

[270] 吕端（933—998） 字易直，幽州安次（今属河北）人，宋太宗时为宰相。《宋史·吕端传》说：“太宗欲相端，或曰：‘端为人糊涂。’太宗曰：‘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相之。”

[271] 各条标点，应如下：

“国朝陈锡路《黄嬭余话》云：唐傅奕考覈道经众本，有项羽妾本；齐武平五年，彭城人开项羽妾冢，得之。”

“国朝欧阳泉《点勘记》云：欧阳修《醉翁亭记》‘让泉也’，本集及滁州石刻并同；诸选本作‘酿泉’，误也。”

“袁石公典试秦中后，颇自悔其少作；诗文皆粹然一出于正。”

“考……顺治中，秀水又有一陈忱，……著《诚斋诗集》、《不出户庭录》、《读史随笔》、《同姓名录》诸书。”

[272] 霁野 李霁野（1904—1997），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翻译家。译有剧本《往星中》（安特来夫）、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有短篇小说集《影》及《回忆鲁迅先生》等。

[273] 织芳 即荆有麟。参看本卷第79页注〔15〕。

[274] “方糖” 即霜糖，河南开封地区的名产。当地的口音读“霜”为“方”。

[275] 景宋 许广平（1898—1968），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鲁迅夫人。著有《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遭难前后》、《鲁迅回忆录》等。

[276] 摩托车 这里指小汽车。

[277] 吴玉帅 指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字子玉）。1926年春他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进攻国民军，4月，国民军失败退出北京等地，他便在这时来到北京。

[278] L君 指刘复（半农），参看本卷第323页注〔4〕。下文的C君，指齐宗颐（寿山），参看本卷第359页注〔45〕。据鲁迅1926年6月28日日记载：“晴。……往信昌药房买药。访刘半农不值。访寿山。”

[279] 这一段报道见1926年6月28日《世界日报》所载的“本报特讯”。张其锽（1877—1927），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当时是吴佩孚的秘书长。

[280] “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 语出陶潜《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诗。

[281]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1926年7月12日、26日，8月2日、16日《语丝》周刊第八十七、八十九、九十、九十二期。

[282] 《旧事重提》 鲁迅散文集《朝花夕拾》各篇最初在《莽原》半月刊上发表时的总名。

[283] S州 指河南陕州（今三门峡）。1924年7、8月间，鲁迅曾应陕西教育厅和西北大学的邀请到西安讲学，往返都经过这里。

[284] 鼓吹什么“捕蝇” 当时北京有些团体和学校提倡捕蝇活动，有的举办捕蝇比赛会，有的出资以发动贫苦小孩捕蝇出卖。

[285] 《茶香室丛钞》 俞樾所著笔记，共四集，一〇六卷。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清代学者。

[286] 《水浒传》 长篇小说，明代施耐庵著。

[287] 洪迈（1123—1202） 字景庐，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代文学家。《夷坚甲志》，是他所著的笔记小说，原为正集、支集、三集、四集，共四二〇卷；现在留传下来的，以张元济校辑本二〇六卷为较完善。这里所引的一条，出正集甲志第十四卷。

[288] 庄季裕 名绰，字季裕，宋代山西清源（今属清徐）人。《鸡肋编》，是他所著的笔记，内容多述轶闻旧事，凡三卷。这里所引的一条，出于该书卷中。

[289] 陈泰 字志同，号所安，元代茶陵（今属湖南）人，仁宗延祐年间曾官龙泉主簿等职。

[290] 来孙 玄孙的儿子。自本身下数为第六代。

[291] 《涵芬楼秘笈》 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套丛书，共出十集。涵芬楼，商务印书馆存放善本图书的藏书楼名。金侃（约1635—1703），字亦陶，江苏苏州人，清代藏书家。

[292] 空六 即陈廷璠，陕西鄠县（今户县）人，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任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教务主任。

[293] 蚩尤 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九黎族酋长。《史记·五帝本纪》：“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1926年6月，北洋军阀吴佩孚为了宣传“讨赤”，曾经在北京怀仁堂的一次宴会上发表谬论说：“赤化之源，为黄帝时之蚩尤，以蚩赤同音，蚩尤即赤化之祖。”（见《向导》周报第一六一期“寸铁”栏所载陈独秀〔署名“实”〕的《赤化过激都是国粹》一文。）

[294] “超然象外” 语出唐代司空图《诗品》：“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原意是形容诗歌的“雄浑”的风格，这里是对人生社会漠不关心的意思。

[295] 张之江（1882—1966） 字紫珉，直隶盐山（今属河北）人，国民军将领。1926年冯玉祥通电下野后他任西北边防督办、西北军总司令。关于他的《整顿学风电》，参看本卷第287页注〔7〕。

[296] 丁文江（1887—1936） 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曾任工商部地质研究所所长等职。1926年4月，孙传芳任命他为淞沪商埠总办；5月28日，他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其中有“鄙人为一书呆子，一大傻子，决不以做官而改变其面目”等语。（见1926年5月29日上海《新闻报》）

[297] 1926年6月19日，复旦通信社记者访问英国庚款委员会华方委员胡适，就英国退还庚款用途提出问题。记者问：“庚款用途已否决定？”胡答：“已经决定。”又问：“决定系作何项用途？”胡答：“此时不能宣布。”又问：“究竟于中国有无利益？”胡答：“以余个人之观察，甚觉满意。”等等。（见1926年6月20日北京《晨报》）

[298] 牛荣声 事迹不详。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八期（1926年6月5日）发表《“开倒车”》一文说：“今人说某人是‘开倒车’，某事是‘开倒车’，并不见得某人便真腐败，守旧，某事便真不合现代的潮流。也许是因为说话的人有了主观的偏见，也许是他太急进，也许是他的见解根本错误。即如现在急进派骂稳健派为‘开倒车’，照他们的主张，必须把知识阶级打倒，把一切社会制度根本推翻，方不是‘开倒车’。”

[299] 孙传芳（1885—1935） 字馨远，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曾任浙江督军，1926年夏他盘踞苏浙等地时，曾下令禁止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系用模特，并一再写信给该校校长刘海粟，以为模特有违中国的“衣冠礼教”，必须严禁。如他在6月3日的一封信中说：“生人模型，东西洋固有此式，惟中国则素重礼教，四千年前，轩辕衣裳而治，即以裸裎袒裼为鄙野。……模特儿止为西洋画之一端，是西洋画之范围必不以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亦何必求全召毁，俾淫画淫剧易于附会。”（见1926年6月10日上海《新闻报》）刘海粟（1896—1994），字季芳，江苏武进人，美术家。1919年创办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实行男女同校，在教学中推行人体模特写生。

[300] 亚伯拉罕（Abraham） 犹太族的始祖，约当公元前2000年自迦勒底迁居迦南（见《旧约·创世记》）。这里所说黄帝即亚伯拉罕的考据，是日本佐佐木照山在一篇关于《穆天子传》的文章中所发的怪论。

[301] 《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 1926年4月东京聚芳阁出版，是一本贬损中华民族的书。

[302] Smith 斯密斯（1845—1932），通译阿瑟·亨·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美国传教士，1872年（同治十一年）来华，居留五十余年。他所著的《中国人气质》一书，1894年由美国佛莱明公司在纽约出版，日本江保译本，1896年东京博文馆出版。

[303] 都介涅夫（И.С.Тургенев，1818—1883） 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这里是指他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类型的人物。

[304] 品青 即王品青。参看本卷第205页注〔12〕。

[305] 《闾邱辨囿》 丛书名。清代顾嗣立辑，共收书十种。

[306] “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 1917年7月张勋扶持溥仪复辟，事前曾得到段祺瑞的默契。段祺瑞原想利用张勋来解散国会，推倒总统黎元洪；但复辟事起，全国人民一致反对，他便转而以拥护共和为名，于7月3日在天津西南面的马厂誓师，出兵讨伐张勋。张勋失败后，北洋政府曾规定这天为“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日”。

[307] 万牲园 清光绪末年，农商部在北京西直门外三贝子花园原址建立农事试验场，内设动物园，俗称万牲园（亦作万生园），即今北京动物园的前身。

[308] 《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一、七十二期（1926年4月17日、24日）刊载陈西滢所作《闲话》，列举他认为是“中国新出有价值的书”共十一种，其中举《玉君》为长篇小说的代表说：“要是没有杨振声先生的《玉君》，我们简直可以说没有长篇小说。”杨振声（1890—1956），山东蓬莱人，作家。《玉君》，现代社文艺丛书之一，1925年出版。

[309] “八珍” 用八种烹调方法制成的食品。据《周礼·天官·膳夫》：“珍用八物。”东汉郑玄注：“珍，谓淳熬、淳母、炮、珍、渍、熬、糁、肝膋也。”

[310] 《酉阳杂俎》 段成式著，二十卷，续集十卷。内容多记秘书异事，为唐代笔记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种；御赐菜帐见卷一《忠志》篇。段成式（约803—863），字柯古，齐州临淄（今属山东）人，唐代文学家。

[311] 《随园食单》 袁枚著，四卷。袁枚（1716—1798），字子才，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代诗人。曾任江苏溧水、江浦、江宁等县知县，退职后购筑随园于江宁城西小仓山，故又号随园。

[312] 《饮馔正要》 应作《饮膳正要》，元代和斯辉著，三卷。和斯辉在元仁宗延祐间（1314—1320）曾任饮膳太医，该书记载饮膳卫生和育婴妊娠等知识。

[313] 《膳夫经手录》 唐代杨煜著，四卷。书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1056）。杨煜（《新唐书》作阳晔），曾任巢县县令。

[314] 威廉士（S.W.Williams，1812—1884） 美国传教士。1833年（道光十三年）来华传教，1856年后在美国驻华公使馆任职。《中国》一书出版于1848年，1883年修订再版。

[315] “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语出《论语·子张》：（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纣，商代最后一个君主。

[316] “会稽竹箭” 语出《尔雅·释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

[317] 肉苁蓉 一年生寄生草本植物，茎肉质，高尺余，形如短柱。李时珍《本草纲目》说：“此物补而不峻，故有从容之号，从容，和缓之貌。”

[318] 《留东外史》 平江不肖生（向恺然）著。是一部描写清末我国留日学生生活的类似“黑幕小说”的作品。

[319] 《嘉泰会稽志》 宋代施宿等撰，二十卷。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完成，故名。1926年夏绍兴周肇祥等据清嘉庆间采鞠轩刊本影印。施宿（？—1213），字武子，湖州长兴（今浙江吴兴）人，绍熙进士，曾任绍兴府通判。

[320] 乔峰 周建人（1888—1984），字乔峰，鲁迅的三弟，生物学家。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译有达尔文《种的起源》、生物学论文选集《进化与退化》；著有《生物进化浅说》、《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等。

[321] 丛芜 韦丛芜（1905—1978），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布宁（И.А.Бунин，1870—1953），又译蒲宁，俄国小说家。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后死于巴黎。

[322] 强汝询（1824—1894） 字荛叔，江苏溧阳人，清咸丰举人。著有《求益斋文集》。他在《佩雅堂书目小说类序》中说，做小说是“敝神劳思，取媚流俗，甘为识者所耻笑，甚矣其不自重也！……魏晋以来小说，传世既久，余家亦间有之，其辞或稍雅驯，姑列于目；而论其失，以为后戒焉。”参看《小说旧闻钞·禁黜》。

[323] 关岳 指关羽和岳飞。旧时把他们作为忠义的化身，建立专祠奉祀。1914年袁世凯政府下令以关羽、岳飞合祀。以后，北洋政府也不断地祭祀关岳。

[324] 中央公园 今北京中山公园。原为明清皇家社稷坛，1914年辟为公园。

[325] 寿山 齐寿山（1881—1965），名宗颐，字寿山，河北高阳人，德国柏林大学毕业，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视学。

[326] 《小约翰》 长篇童话诗，荷兰望·蔼覃著。鲁迅译本收入《未名丛刊》，1928年1月出版。

[327]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1926年7月19日、23日《世界日报副刊》。

[328] 素园 韦素园（1902—1932），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北京大学毕业。译有果戈理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等。参看《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329] 毕力涅克（Б.А.Пильняк，1894—1937） 又译皮涅克，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同路人”作家。1926年夏曾来中国，在北京、上海等地作短期游历。

[330] 泰戈尔（R.Tagore，1861—1941） 印度诗人。1924年4月间曾来我国访问。“竺震旦”是他在中国度六十四岁生日时梁启超给他起的中国名字。我国古代称印度为天竺，简称竺国；那时印度一带僧人初入中国，多用“竺”字冠其名。震旦是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

[331] 甘地（M.Gandhi，1869—1948）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他主张“非暴力抵抗”，长期倡导对英国殖民当局“不合作”运动，屡被监禁，在狱中以绝食作为斗争的手段。

[332] 伊本纳兹（1867—1928） 通译伊巴涅兹，西班牙作家、共和党的领导人。参看本卷第571页注〔4〕。1924年春曾随美国一个世界游历团来我国游历。

[333] 据上海《教育杂志》第十七卷第十二号（1925年12月20日）和第十八卷第一号（1926年1月20日）记载，第十一届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于1925年10月在湖南长沙召开。会上通过“今后教育宜注意民族主义案”，其办法是：“（一）历史教科书，应多采取吾国民族光荣历史，及说明今日民族衰弱之原因。（二）公民教育应以民族自决为对外唯一目的。（三）社会教育，宜对于一般平民提倡民族主义，以养成独立自主之公民。（四）儿童教育多采用国耻图画国耻故事，以引起其爱国家爱种族之观念。”

[334] 斯吉泰烈支（С.Г.Скиталед，1868—1941） 俄国小说家。十月革命时逃亡国外，1930年回国。著有《契尔诺夫一家》等。

[335] 任国桢（1898—1931） 字子卿，辽宁安东（今丹东）人，北京大学俄文专修科毕业。《苏俄的文艺论战》，是他选译当时苏俄杂志中的不同派别的四篇文艺论文编辑而成；为鲁迅主编的《未名丛刊》之一，1925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336] 里培进司基（Ю.Н.Либединский，1898—1959） 通译李别进斯基，苏联作家。《一周间》，中篇小说，描写苏联克服内战以后的经济困难和白匪骚乱的故事。

[337] 尾濑敬止（1889—1952） 日本翻译家。曾任东京《朝日新闻》和《俄罗斯新闻》的记者，生平致力于介绍、翻译俄国文学。

[338] 勃洛克（А.А.Блок，1880—1921） 苏联诗人。早期为俄国象征派诗人；后受1905年革命影响，开始接触现实，十月革命时倾向革命。著有《俄罗斯颂》、《十二个》等。

[339] 托罗兹基（Л.Д.Троцкий，1879—1940） 通译托洛茨基，早年参加俄国工人运动，参与领导十月革命，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他成为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领袖，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国，1940年被刺于墨西哥。

[340] 江朝宗（1863—1943） 字宇澄，安徽旌德人。清末候补道员，曾任汉中总兵。1917年任京津临时警备副司令，支持张勋复辟，失败后在同年8月11日得北洋政府授以“迪威将军”的头衔。王芝祥（1858—1934），字铁珊，直隶通县（今属北京）人。清末任广西按察使等职，1924年任北洋政府侨务总裁，曾用佛教慈善团体名义组织世界红字会，自任会长。

[341] “密斯” 英语Miss的音译，意为小姐。“密斯得”，英语Mister的音译，意为先生。

[342] “向隅” 见汉代刘向《说苑·贵德》：“古人于天下，譬一堂之上；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后来用以比喻得不到平等的待遇。

[343] “何必改作” 语出《论语·先进》：“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

[344] 李太白（701—762） 名白，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后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唐代诗人。杨朱，战国时魏国人，思想家。

[345] 威尔士（Н.G.Wells，1866—1946） 通译威尔斯，英国著作家。著有《世界史纲》和科学幻想小说《时间机器》、《隐身人》等。

[346] 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 意大利诗人，主要作品有《神曲》等。

[347] 跋忒莱尔（1844—1910） 英国作家，但丁的研究者。著有《但丁及其时代》等。曾译《神曲》为英文，并加注释。

[348]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八期（1925年4月11日）《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一文中，说他和章士钊于1921年夏曾在英国访问威尔士和萧伯纳；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号（1925年7月25日）《孤桐杂记》中，又将陈西滢的这一段文字改写为文言。此外，陈西滢在其他文章中还常谈到威尔士、萧伯纳和莎士比亚等。

[349] 曼殊斐儿（K.Mansfield，1888—1923） 通译曼斯菲尔德，英国女作家，著有小说《幸福》、《鸽巢》等。徐志摩翻译过她的作品。他在《自剖集·欧游漫录》中说：“我这次到欧洲来倒像是专做清明来的；我不仅上知名的或与我有关系的坟，……在枫丹薄罗上曼殊斐儿的坟……”又陈西滢曾在《现代评论》上一再谈到法朗士，徐志摩也“夸奖”他学法朗士的文章已经“有根”了。

[350]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8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五期。

[351] C君 即齐寿山。“做点小工作”，指翻译《小约翰》，参看本书《马上支日记》“七月六日”一节。

[352] 檀越 佛家语，梵文Dānapati的意译，又译作施主，指向寺院施舍财物的世俗信徒。

[353] 方玄绰 作者1922年所作短篇小说《端午节》（后收入《呐喊》）中的主要人物。

[354]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语出《文选·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355]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8月28日《语丝》周刊第九十四期。原题《记鲁迅先生的谈话》，署名培良。

[356] 培良 向培良，参看本卷第56页注〔2〕。

[357] 《工人绥惠略夫》 俄国阿尔志跋绥夫（M.П.Арцыбашев，1878—1927）著中篇小说，鲁迅译本于1922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又于1927年6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358] 该撒（G.J.Caesar，前100—前44） 通译恺撒，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克来阿派忒拉（Cleopatra，前69—前30），通译克利奥佩特拉，埃及女王。大马色（Damascus），通译大马士革，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现为叙利亚的首都。

[359] 对德和约 指1921年5月20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德协约》。其中规定德国放弃以前在山东攫取的特权，双方声明保护在各自管辖下的对方财产，并决定重建外交关系，互派公使。

[360] 这段话见于《工人绥惠略夫》第六章。

[361] “毛鸦头” 即毛丫头，吴稚晖对女师大学生的蔑称。参看本卷第129页注〔12〕。

[362] 任可澄（1877—1946） 字志清，贵州普定（今安顺）人。1926年6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8月末，他将女师大与女大合并为北京女子学院，自兼院长。

[363] 林素园 福建人，1926年8月女师大被改为北京女子学院师范部时出任学长，同年9月5日率军警武装接收北京女师大。

[364]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10月2日《语丝》周刊第九十九期。

[365] 1919年12月，鲁迅回绍兴接母亲等家眷到北京，同住八道湾。

[366] “使之闻之” 语出《论语·阳货》：“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367] 投壶 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投矢壶中，负者饮酒。《礼记·投壶》孔颖达注引郑玄的话，以为投壶是“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孙传芳盘踞东南五省时，曾于1926年8月6日在南京举行过这种古礼。

[368] “无枪阶级” 涵庐（高一涵）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1926年8月21日）的《闲话》中说：“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收起互骂的法宝，做我们应该做的和值得做的事业。万一骂溜了嘴，不能收束，正可以同那实在不敢骂的人们，斗斗法宝，就是到天桥走走，似乎也还值得些！否则既不敢到天桥去，又不肯不骂人，所以专将法宝在无枪阶级的头上乱祭，那末，骂人诚然是骂人，却是高傲也难乎其为高傲罢。”按天桥附近，是当时北京的刑场。

[369] 《消闲录》 上海出版的一种小报。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11月创刊，原名《消闲报》，1903年改为《消闲录》。

[370] 吉柏希（Gypsy） 通译吉卜赛。原居住印度北部的一个民族，十世纪时开始向外迁移，流浪在欧洲、西亚、北非等地，大多靠占卜、歌舞等为生。

[371] 软刀 语出明朝遗民贾凫西所作的《木皮散人鼓词》：“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得太白旗悬才知道命有差。”这里借用“软刀子”来比喻现代评论派的言论。

[372] 这是陈西滢在《致志摩》（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中攻击鲁迅的话，参看本书《无花的蔷薇》第八节。

[373] 本篇最初发表于厦门《波艇》月刊第一号（原刊未注明出版年月，当为1926年12月）。

[374] H.M. 是“害马”的罗马字拼音“Haima”的缩写。这是鲁迅对许广平的戏称，因在女师大风潮中她和五位学生自治会职员曾被杨荫榆称做“害群之马”。

[375] 郑成功（1624—1662） 本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清顺治三年（1646），他反对父亲郑芝龙投降清王朝，在南澳起兵，驻守金门、厦门，连年出击闽粤江浙等地，屡败清兵；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率舰队渡台湾海峡，驱逐侵占我国领土的荷兰殖民者，积极经营台湾，以作抗清根据地。在他死后，厦门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台湾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先后被清兵攻占。下文的“圣祖仁皇帝”是清朝康熙皇帝的庙号。

[376] 清代王先谦《十朝东华录》：康熙二十二年十月，“礼部议复，国子监祭酒王士正（按即王士禛）奏：明代南北两雍，皆有《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刻板，今国学所藏，漫漶残缺，宜及时修补……从之。”按在清康熙时仅有明监本（明代国子监刻印的版本）“二十一史”；至乾隆时合“二十一史”及《旧唐书》、《旧五代史》、《明史》共二十四部，定为“正史”，由武英殿刻印；“殿板”，即指武英殿所刻的版本。

[377] 厦门大学附近的镇北关是郑成功为防御清兵而建造的，靠近城脚的海滩满铺可做玻璃原料的白沙，当时有人把它偷运到鼓浪屿，卖给台湾人设立的货栈，再转运到日本占领下的台湾的玻璃厂。

[378] 梅兰芳（1894—1961） 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艺术家。

[379] 曼陀罗 亦称“风茄儿”，茄科，一年生有毒草本，花大，色白。

[380] 朋其 黄鹏基（1901—1952），笔名朋其，四川仁寿人。《莽原》撰稿人，后加入狂飙社。他在短篇小说集《荆棘》的代序《自招》里说：“得朋友的一株霸王鞭是今年，废物利用，我把它种在一把没有盖的茶壶里，虽然不很茂，但竟没有死。”霸王鞭，灌木状常绿植物，茎有五棱和乳凸硬刺，开绿色小花。热带地区常栽做绿篱。

[381] Borel 亨利·包立尔，荷兰人。清末曾来中国，在北京、厦门、漳州、广州等地居住多年。著有《新中国》、《无为》（一本关于老子哲学的书）等。

[382] “金石例” 指墓志碑文的写作体例。元代潘昂霄著有《金石例》十卷；以后明代的王行，清代的黄宗羲、梁玉绳、李富孙、王芑孙等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著作。

[383]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11月27日《语丝》周刊一〇七期。

[384] 涵庐（高一涵）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1926年8月21日）上发表的《闲话》中曾说：“报纸上的言论，近几年来，最烩炎（脍炙）人口的，绝不是讨论问题和阐发学理的一类文字，只是揭开黑幕和攻人阴私的一类文字。越是板着学者的面孔，讨论学术问题的文字，看的人越少；越是带着三分流氓气，喜笑怒骂的揭黑幕攻阴私的文字，看的人越多。”又说：“社会上既欢迎嬉笑怒骂的文字，而著作家又利用社会的弱点，投其所好，又怎能不造成报界风气，叫人家认《小晶报》为大雅之声明呢？”

[385] 漱园 即韦素园，当时在北京主持莽原社工作。鲁迅1926年11月7日日记：“上午得素园信二封，廿九及卅日发。”

[386] 宋玉 战国时楚国诗人。这里引的两句，见他所著的《九辩》。

[387] 刀山剑树 佛教宣扬的地狱酷刑。《太平广记》卷三八二引《冥报拾遗》：“至第三重门，入见镬汤及刀山剑树。”

[388] “桃之夭夭” 语见《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夭夭”，形容茂盛、艳丽。

[389]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12月18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十八期。

[390] 《文学周报》 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1921年5月在上海创刊。原名《文学旬刊》，为《时事新报》副刊之一，郑振铎等主编。1923年7月改名《文学》（周刊）；1925年5月又易名为《文学周报》，独立发行，1929年6月停刊，前后约出四百期。西谛，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他的文章发表于《文学周报》第二五一期（1926年11月21日），题目为《“呐喊”》。

[391] 这些话都是针对高长虹说的。高在《狂飙》周刊第一期（1926年10月）《走到出版界》的《革革革命及其他》一则内，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但不久在《狂飙》第五期（1926年11月）《走到出版界》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却攻击鲁迅已“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中还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例，以见“老人”之难免“倒下”，说：“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所谓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当有以善自处了！”按高长虹（1898—约1956），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

[392] 这里所说的“有人”，指高长虹等。高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里说：“我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同时诽谤鲁迅“要以主帅自诩”。“别人”，指陈西滢等。参看本卷第253页注〔29〕。

[393] 孙伏园（1894—1966） 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后在北京大学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先后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曾与作者同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394] “下里巴人” 古代楚国的通俗歌曲。《文选》卷四十五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395] 高一涵（1885—1968） 笔名涵庐等，安徽六安人，曾留学日本，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派成员。这里所引文字见于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1926年8月21日）的《闲话》。在这篇《闲话》中，他指责当时著作家“多以骂人起家”，接着就以《阿Q正传》为例，写下这里所引的一段话。

[396] “走到出版界” 高长虹在他主编的《狂飙》周刊上陆续发表的批评文字的总题，后印单行本，1928年7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

[397] “绥惠略夫” 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以绥惠略夫自比，说他初访鲁迅的情形，使他“想像到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亚拉籍夫也是《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

[398] “会逢其适” 语出《文中子·中说·周公》，原是“会当其意有所适”的意思。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号（1925年7月18日）发表的《毁法辨》中错误地把它当作“适逢其会”来用。作者在这里顺笔给予讽刺。

[399] 何作霖 广东东莞人，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任《晨报》编辑。1922年初孙伏园回绍兴探亲，由他代为主编《晨报副刊》。

[400] Grotesk 德语，意思是古怪的、荒诞的。

[401] 包龙图 即包拯（999—1062），字希仁，安徽合肥人。宋仁宗时进士，历官监察御史、开封知府、枢密副使、龙图阁直学士等职。以立朝刚毅著称。旧时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在《三侠五义》等小说或戏剧中，都有他用铡刀铡犯人的故事。

[402] 指敬隐渔的法文译本和梁社乾的英文译本。法文译本发表于罗曼·罗兰主编的《欧罗巴》月刊第四十一、四十二期（1926年5月15日、6月15日）；《序》被删去，其余各章均有节略。英文译本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403]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7年1月15日《北新》周刊第二十一期。

[404] SF 指日本福冈诚一（1897—1975），俄国盲人作家爱罗先珂的朋友，曾与爱罗先珂同在鲁迅家中住过。鲁迅1926年12月19日日记载：“得淑卿信，九日发，附福冈君函。”即指此信。

[405] 跫然的足音 语出《庄子·徐无鬼》：“夫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通常用“空谷足音”比喻难得的令人欣喜的消息。

[406] 德富苏峰（1863—1957） 日本著作家。曾任参议院议员、东京国民新闻社社长。著有《人物管见》、《成篑堂闲记》等。

[407] 《三藏取经记》 即《大唐三藏取经记》。旧藏日本京都高山寺，后归德富苏峰成篑堂文库。书缺第一卷的上半卷和第二卷。下文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旧藏日本高山寺，后归大仓喜七郎。书缺上卷第一则和中卷第八则。两书均为三卷，内容完全相同。

[408] 缺笔 从唐代开始的一种避讳方式，即在书写或镌刻本朝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时省略最末一笔。

[409] 罗振玉（1866—1940） 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金石学家。清末曾任学部参事官等职，辛亥革命后，长期从事复辟清室的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所著《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共二卷，1918年出版。

[410] 《易林注》 《易林》，西汉焦赣（延寿）撰，十六卷。《易林注》是后人的注本。作者这里所说的《易林注》是元代人的注本。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残本，实为元刊。《四部丛刊》中有全本，系借吴兴蒋氏密韵楼影元写本补足。《四部丛刊》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丛书，张元济辑，据珍本和善本影印，分初编、续编、三编，收入古籍五百零四种。

[411] 蝶装 即蝴蝶装，图书装订名称。其法系将书叶反折，即有字的纸面相对折叠，将中缝的背口粘连，再用厚纸包装作封面。翻阅时，开展如蝴蝶的双翅，故名。

[412] 缪荃荪（1844—1919） 字筱珊，号艺风，江苏江阴人，清光绪进士，藏书家、版本学家。著有《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文集》等。

[413] 阴时夫 名幼遇，字时夫，隆兴奉新（今属江西）人。宋末进士，入元不仕。《韵府群玉》，是他所撰的一部类书，二十卷。

[414] 《宣和遗事》 即《大宋宣和遗事》。宋元间人作。分四集或前后二集，内容叙述北宋衰亡和南宋南迁临安时期的史事。

[415] 胡应麟（1551—1602） 字元瑞，号少室山人，浙江兰谿人，明代学者。万历举人，未仕。著有《少室山房笔丛》、《少室山房类稿》等。他说《宣和遗事》为元朝人所作的话，见《笔丛》卷四十一，鲁迅已收入《小说旧闻钞》的《大宋宣和遗事》条内。

[416]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12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十三期，又同时发表于《语丝》、《北新》、《新女性》等期刊。

[417] 《新女性》 月刊，妇女问题研究会编辑，1926年1月1日创刊，上海开明书店发行。1929年12月停刊，共出四十八期。

[418] 狂飙社 高长虹、向培良等所组织的文学团体。1924年11月，曾在北京《国风日报》上出过《狂飙》周刊，至十七期停止；1926年10月，又在上海光华书局出版，次年1月停刊。另编印《狂飙丛书》。

[419] 《乌合》《未名》 即《乌合丛书》和《未名丛刊》，是鲁迅在北京编辑的两套丛书；《乌合》专收创作，《未名》专收译本。《弦上》，是狂飙社在北京编印的一种周刊，1926年2月创刊。

[420] 第三顶“纸糊的假冠” 指狂飙社广告所加于鲁迅的“思想界先驱者”的称号。这里说“第三顶”，是因为在这以前已有人称鲁迅为“思想界的权威者”和“青年叛徒的领袖”。

[421] “世故的老人” 高长虹在《狂飙》第五期（1926年11月）发表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曾诋毁鲁迅为“世故老人”；并对鲁迅在女师大事件中反对章士钊的斗争加以嘲骂说：在“实际的反抗者（按指女师大学生）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

[422]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7年1月15日《语丝》周刊第一一四期。

[423] 指《〈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和《新的世故》，均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424] “黄仲训霸占公地” 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郑成功曾在鼓浪屿日光岩建督操台，操练水师。1926年秋，黄仲训在这里侵占公地建筑瞰青别墅，引起舆论反对。随后黄登报声明：所建别墅将供众人游览，以瞻仰民族英雄郑成功故垒，别墅因得继续修建。黄仲训，厦门人，清末秀才，越南华侨。

[425] 这是对于高长虹的驳斥。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曾说：“鲁迅是一个直觉力很好的人，但不能持论。如他对自己不主张批评，我不反对。但如因为自己不能批评，便根本反对批评，那便不应该了。”

[426] 卓治 魏兆淇（1904—1978），笔名卓治，福建福州人。1926年9月从上海南洋大学转学厦门大学。这里他所说的话，可参看鲁迅1927年1月5日给许广平的信：“记得先前有几个学生拿了《狂飙》来，力劝我回骂长虹。说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许多青年等着听你的话！”（《两地书·一〇五》）

[427] 厦门大学革新的消息 1926年6月和8月，上海《申报》和《时事新报》先后发表厦门大学“革新消息”，介绍该校创办人陈嘉庚增拨基金和经费，大规模地扩充学校，并增设国学研究院。如8月4日《时事新报》刊载《厦门大学最近之发展》一文说：“不数年间，厦大当可望为中国完善大学之一，除广筑校舍购备仪器图书等外，该校长林文庆，目下最注意者，为延聘国内外名宿，使学生得良师之诱导……且以（已）聘定北大沈兼士、周树人（鲁迅）、顾颉刚以整理国学……果能如此致力进行，加以经费充裕，将来国学研究院定有相当成绩，为吾国学术界别开生面也。”同一期间，《申报》和《时事新报》还多次刊登厦门大学新聘教授周树人等的行踪。

[428] “见面时一谈，不见时一战” 这是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一期（1926年10月）发表的《答国民大学×君》一文中的话：“文字上的冷箭，我也略知一二，大概还不至于十分吃亏。以冷箭来，以冷箭报，不违古礼，且合新谊。见面时谈一谈，不见面时战一战，也可减少一些单调。”

[429] 《汉画象考》 鲁迅准备编印的关于美术考古的一部专书。他历年搜集和研究汉魏六朝石刻的画象和图案，已成《六朝造象目录》一书（未印），但汉画象部分并未完成。《古小说钩沈》，参看本卷第254页注〔36〕。作者生前未出版。

[430] 语堂 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改名玉堂，又改语堂，福建龙溪人，作家，语丝社成员。曾留学美国、德国，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时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提倡“幽默文学”和“以自我为中心，闲适为格调”的“性灵”文学。

[431] 兼士 沈兼士（1885—1947），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家。日本东京物理学校毕业，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时任厦门大学文科国学系主任，兼国学研究院主任。

[432]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7年2月12日《语丝》周刊第一一八期。

[433] 蓝青官话 指夹杂地区性方言的普通话。蓝青，比喻不纯粹。

[434] 《唐宋传奇集》 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小说，1927年12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这里说的后记，即书末的《稗边小缀》，现收入《古籍序跋集》。

[435] 这里指高长虹。他在《狂飙》第五期（1926年11月）发表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曾说：“当我在《语丝》第三期看见《野草》第一篇《秋夜》的时候，我既惊异而又幻想。惊异者，以鲁迅向来没有过这样文字也。幻想者，此入于心的历史，无人证实，置之不谈。”

[436] 刘树杞（1893—？） 字楚青，湖北新埔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时任厦门大学秘书兼理科主任。当时，厦大国学研究院暂借生物学院三楼作为国学院图书或古物的陈列所，刘树杞曾授意他人讨还房子。以后，鲁迅辞职，有人以为是被刘树杞排挤走的，因而发生了“驱逐刘树杞”，“重建新厦大”的风潮。其实，鲁迅主要是因为对厦门大学当局不满而辞职的。

[437] 1924年4月，厦门大学学生对校长林文庆不满，开会拟作出要求校长辞职的决议，因部分学生反对而作罢。林文庆为此开除为首学生，解聘教育科主任等九人，从而引起学潮。林又拒绝学生的任何合理要求，并于6月1日诱使建筑工人凶殴学生，继又下令提前放暑假，限令学生五日离校，届时即停膳、停电、停水。学生被迫宣布集体离校，在被解聘教职员帮助下，到上海共同筹建大夏大学，借小沙渡路二十号为校舍，于9月22日开课。11月22日由董事会推举马君武为校长。

[438] “别种的谣言” 指黄坚（白果）、陈万里（田千顷）等人散布的谣言。如说鲁迅“不肯留居厦门，乃为月亮（按指许广平）不在之故”（见《两地书·一一二》）等。黄坚，字振玉，江西清江人，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职员。经顾颉刚推荐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陈列部干事，兼文科主任办公室襄理。陈万里（1891—1969），江苏吴县人，经顾颉刚推荐任厦门大学国学院考古导师等职。

[439] “天下纷纷，何时定乎？” 语出《史记·陈丞相世家》。

[440] 林文庆（1869—1957） 字梦琴，福建海澄人，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硕士，香港大学荣誉医学博士。当时任厦门大学校长兼国学研究院院长。

[441] “当面输心背面笑” 语出唐代诗人杜甫的《莫相疑行》一诗：“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

[442] “新的时代”的青年 指高长虹。他在《狂飙》周刊第二期（1926年10月）给鲁迅的公开信中说到《狂飙》周刊时，曾说：“这次发刊，我们决意想群策群力开创一新的时代。”

[443] 集美学校 爱国华侨陈嘉庚1913年在他家乡厦门市集美镇创办。初为小学，以后陆续增办中学、师范部等。

[444] 叶渊（1888—1952） 字采真，福建安溪人，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时任集美学校校长。

[445] “先意承志” 语出《礼记·祭义》：“君子之所为孝者，先意承志。”是孔子弟子曾参的话。意思是预测父母的意志承奉而行。